



金融与发展

2019年9月号

应对避税港问题

第6页

暗网的真相

第22页

腐败的代价

第26页



跟踪
资金的流向

目录



4

本可以用于改善民生的巨额资金被转移到避税港，或流入腐败官员的口袋。

全球经济的隐蔽角落

- | | | | |
|----|--|----|--|
| 4 | 启示之光
提高资金透明度需要改善治理
戴维·利普顿 | 18 | 隐私与透明度
在打击非法资金流时，各国必须实现适当的平衡
杰伊·珀塞尔、伊凡娜·罗西 |
| 6 | 应对避税港问题
避税港吸引着数十亿资金，这对于资金流出国和流入国造成了同样的危害
尼古拉斯·萨克斯森 | 22 | 暗网的真相
暗网的初衷是保护异见人士，但它同时也掩盖了诸多非法活动
阿迪蒂·库马尔、埃里克·罗森巴赫 |
| 11 | 影子投资的兴起
避税天堂的空壳公司破坏了发达、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税收管理
扬尼克·达姆加德、托马斯·埃尔克亚、尼尔斯·约翰内森 | 26 | 腐败的代价
贪污造成税收损失，而且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保罗·莫罗、保罗·梅达斯、让-马克·福尼尔 |
| 14 | 征税时代
希腊税务机构负责人的任务是努力提高国民的税收合规意识
玛丽亚·彼得拉基斯 | 30 | 艺术品背后的洗钱犯罪
监管不力的艺术品市场充斥着洗钱犯罪的机会
汤姆·麦施博格 |



35

本期还有

- 35 **弊大于利**
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可以从减少腐败中获得更大的益处
尼尔森·索布里尼奥、维姆·塔库恩
- 38 **新闻调查与揭秘**
腐败曝光，调查记者功不可没
安德烈亚斯·阿德里亚诺
- 48 **点亮经济增长**
地球夜晚卫星图揭示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其他很多信息
姚佳雄



6

其他内容

- 40 **经济学人物**
肩负使命的经济学家
康铨承近期有幸采访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蒂夫·米安。米安教授认为，从道德角度来看，弥合贫富差距势在必行
- 44 **前沿**
说服市场
彼得·普雷特重温欧洲央行在面对欧元危机时采取的一些非同寻常的货币政策
- 46 **图表释义**
给我庇护
离岸避税天堂的财富加剧了不平等
李丽军、克里斯·威利茨
- 52 **回归基础**
什么是压力测试？
检查银行的健康状况对确保金融稳定至关重要
马丁·契亚科、大浦博子、莉莉安娜·舒马赫
- 55 **书评**
《第三支柱：社群是如何落后于市场与国家的》，拉古拉姆·拉詹
- 56 **货币**
货币整形
日本用全息图、先驱人士和标志性的艺术来美化其货币
梅琳达·韦尔



40



照亮黑暗角落

本期《金融与发展》的内容让我想起一则苏非派的寓言：一名妇女看见一个神秘人在门外寻找什么东西，于是上前问：“你丢什么东西了吗？”“我的钥匙。”那人回答说。于是两人都跪下来找钥匙。这名妇女问：“你是在哪儿弄丢的？”那人回答道：“在我的房间里。”“那为什么你要在这儿找呢？”“因为这里的光线更好。”

教训：我们总是寻找那些最容易找到的答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关注进行秘密交易的暗网，秘密交易为逃税和避税、洗钱、非法资金流动和腐败提供了温床。

看看这些数据吧：每年的贿赂金额高达1.5万亿—2万亿美元；偷逃税使得政府一年损失3万亿美元，通过其他非法活动造成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这些钱本可以用于全球数百万人的医疗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而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更大：腐败扭曲了激励机制，破坏了公众对体制的信任。而这正是年轻人每天遭遇诸多经济不公的根源。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保罗·莫罗和其他人一起探讨了各国如何才能建立负责任的体制，如何提高政府预算透明度，以及相互之间交换金融信息。杰伊·珀塞尔和伊凡娜·罗西提供了解决透明度和隐私权之间紧张关系的方法。阿迪蒂·库马尔和埃里克·罗森巴赫主张要加强执法、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

这些隐匿的交易并非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凭一国之力就能解决的。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政策和跨国合作。其回报将是巨大的，如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尤其是减少不平等。

因此，我们更有理由让世界经济的黑暗角落暴露于阳光之下。 **FD**

吉塔·巴特 (GITA BHATT)，主编



本期封面

巨额资金被转移到避税港，流入腐败官员的口袋，流向非法企业，而我们对这一情况是如何运作的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在9月号的封面上，插画家约翰·库尔奥 (John Cuneo) 描绘了资金正在流向全球经济的隐藏角落。

主编：Gita Bhatt

执行编辑：Maureen Burke

高级编辑：Chris Wellisz

助理编辑：Marie Boursiquot
Bruce Edwards
Glenn Gottselig
Hyun-Sung Khang

数字编辑：Rahim Kanani

在线编辑：Lijun Li

生产经理：Melinda Weir

文字编辑：Lucy Morales

编辑顾问：

Bernardin Akitoby
Celine Allard
Bas Bakker
Steven Barnett
Nicoletta Batini
Helge Berger
Paul Cashin
Luis Cubeddu
Alfredo Cuevas
Rupa Duttagupta

Thomas Helbling
Tommaso Mancini Griffoli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Christian Mumssen
İnci Ötker
Catriona Purfield
Uma Ramakrishnan
Abdelhak Senhadji
Alison Stuart

©201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版权所有。

如需翻印本刊文章，可通过填写在线表格 (www.imf.org/external/terms.htm)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copyright@imf.org 进行申请。如用于商业用途，可通过版权税计算中心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www.copyright.com) 获得授权，并支付一定的象征性费用。

本刊的文章和其他资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并不反映IMF的政策。

订阅服务、地址变更和其他广告事宜，请联系：

IMF Publication Services
Finance & Development
PO Box 92780
Washington, DC, 20090, USA
Telephone: (202) 623-7430
Fax: (202) 623-7201
E-mail: publications@imf.org

《金融与发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季刊 (地址: 700 19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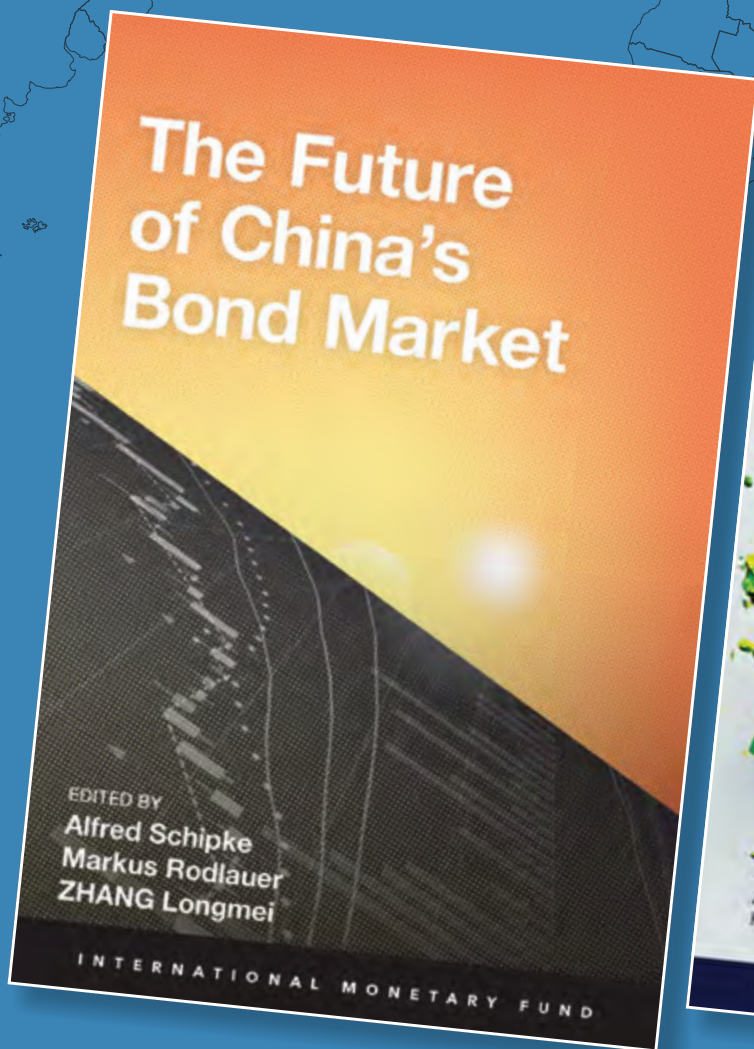
中文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翻译出版。

地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大厦
电话: 010-88190916
传真: 010-88190916
邮政编码: 100142
网址: <http://cfeph.cfemg.cn>
英文版刊号: ISSN 0145-1707
中文版刊号: ISSN 0256-2561



FSC FPO

来自东西方的观点 IMF出版物



Bookstore.imf.org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启示之光

提高资金透明度需要改善治理

戴维·利普顿

去年全球 GDP 达到 87 万亿美元，而 1980 年时仅为 11 万亿美元。虽然 GDP 只是衡量福祉的众多指标之一，但 GDP 的增长十分显著。然而，在开始庆祝之前，我们需要思考以下几个数字，因为它们指出了全球经济的潜在问题：

7 万亿美元

这个数字相当于全球 GDP 的 8%。粗略估计，这也相当于隐藏在离岸金融中心的私人财富的数额，而其中大部分可能都是非法所得。

1 万亿美元

据计算，这是在减少全球三分之一的腐败后，政府可以增加的收入数额。

这些数字揭示了全球经济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即税收、监管和执法机构监管范围之外的非法资金，其中包括腐败所得、监管套利收益，以及来自避税地的利润，相当于逃税所得。总而言之，这些资金的流失损害了公共利益，政府原本可用其改善公众的生活。

数字金融、加密资产和网络犯罪的兴起使资金流失情况雪上加霜。以所谓的“暗网”为例，它是一个隐藏的市场，人们可以在这里交易各种物品，从被盗的身份证件到武器，再到毒品，无所不包。

这些做法，无论是否合法，都严重影响了各国政府的收入。要求国际社会消除监管灰色地带的呼声正与日俱增。

但这不仅仅是执法问题。各国政府目前均承受巨大压力，必须进行调整，以适应全球经济的快速变化。如果处理得当，各国可能因此受益匪浅。同样，金融科技，或可能是加密资产，如果

得到合理使用，也会惠及全球。

目前，对政府资源的需求正不断增强，以满足各种不同的目的，如促进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在新兴市场修建基础设施，以及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和教育水平。因此，数万亿美元的流失会威胁我们的福祉，不仅会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还会削弱政府解决不平等和贫困等关键经济问题的能力。

IMF 的研究显示，在腐败不太严重的国家，公共项目的浪费明显较少。相较于腐败较为严重的国家，低收入国家的教育和医疗预算占比要低三分之一。腐败的存在降低了社会支出的效率。

那么，我们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这正是 IMF 希望改善的领域。近 20 年来，我们与各国当局、多边机构和私营部门密切合作，共同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我们一直走在加强财政透明度和加大反腐力度的前列。

一言以蔽之，这正是治理的核心理念——一个如何全面定义并事无巨细地实施经济政策，同时坚持不懈地贯彻法治精神。去年，IMF 通过了一个加强治理参与度的全面框架，内容涉及与经济最相关的多种职能，如税收、央行、金融业监管及市场监管。

改善治理并非易事，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不仅仅是应为之事，还会切切实实地惠及数百万民众。各国应联合起来，共同行动，这将有助于这项事业取得成功。FD

戴维·利普顿 (DAVID LIPTON) 是 IMF 代理总裁。



图片: ISTOCK / RICH EGGS / KATW

应对 避税港 问题



避税港吸引着数十亿资金，这对于资金流出国和流入国造成了同样的危害

尼古拉斯·萨克斯森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在人们的眼中，避税港是全球经济中有些另类、但又不太重要的助兴节目。这些加勒比群岛或阿尔卑斯地区的金融重镇经常会有各界名流、黑帮以及富有的贵族造访。可自那以后，全世界才清醒地认识到两大事实：第一，避税港这种现象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和重要性远远超过我们大家的想象；第二，世界上最大的避税港并不是我们以前以为的那些地方。

据估算 (Crivelli, de Mooij, and Keen 2015; Cobham and Janský 2018)，避税港造成各国政府每年流失的企业所得税高达 5000 亿至 6000 亿美元，尽管有些避税手段是合法的，但也有非法的。在流失的税收收入中，低收入经济体约占 2000 亿美元，在其 GDP 中的占比超过了发达经济体，甚至超过了它们每年获得的外国发展援助资金 (1500 亿美元)。2017 年，据估算，仅美国的“财富 500 强”企业就有大约 2.6 万亿美元的海外收入，而在 2018 年美国税改后，仅有其中一小部分资金回流美国。

企业并不是唯一的受益方。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 (Gabriel Zucman) (2017) 估计，个人藏匿在避税港的资金高达 8.7 万亿美元。经济学家及律师詹姆斯·S·亨利 (James S. Henry) (2016) 进行了更全面的估算，结果发现，在避税港的个人资金总额令人震惊，竟高达 36 万亿美元。虽然两次估算采用的收益率截然不同，但结果相同，都认为每年全球的个人所得税流失接近 2000 亿美元，这一金额必须计入企业所得税总额中。

由于财务保密性以及零碎不完整的官方数据，加之对避税港缺少普遍认可的定义，这些极不确定的估算结果可谓千差万别。我的结论可归结为两个词：“逃避”和“其他地方”。为了逃避你不喜欢的规则，你把自己的钱拿到其他地方，

离岸或跨境。考虑到这些避税港的影响面远不止包括税收，我倾向于一种更宽泛的定义：避税港为逃避财务法规、信息披露和刑事责任等提供了一条路径。由于利用避税港的企业主要是大型金融机构和其他跨国公司，因此这种制度使竞争环境不利于中小型企业，进而加剧了市场垄断。

虽说避税港的政治危害仍无法衡量，但这种政治危害必须写入“案情记录”中。最关键的是，避税港为那些利用其从事违法活动的精英提供了藏身之地，但牺牲了大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避税港自诩为“税收中立”的中转地，有利于国际资金和投资的自由流动。虽然对有关私人参与者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对整个世界而言，却未必是一件好事。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避税港除了造成税收流失外，资金的跨境自由流动本身就蕴含着风险，比如危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稳定。

通常，一个人越是富有，或者一家跨国公司的规模越大 (有些跨国公司拥有几百个离岸子公司)，那么就越是容易深陷离岸制度中，而且会极力维护这种制度。那些强势的政府也难以置身事外。主要的避税港大部分都位于发达经济体或其领地内。根据税收正义联盟发布的“企业避税港指数”，排名前三位的避税港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群岛和开曼群岛。这些都是英国的海外领地。根据该组织发布的“金融保密指数”，瑞士、美国和开曼群岛是私人财富避税的三大司法管辖区。

要想搞清楚为什么富有的司法管辖区排在榜单的首位，我们不妨思考一下，有多少富有的尼日利亚人将他们的秘密资产藏在日内瓦或是伦敦，然后再思考一下，有多少有钱的瑞士人或英国人把他们的资产藏在拉各斯。离岸资金通常会离开穷国，流向富国。

大约十年前，政界很少对避税港的扩张采取限制措施。

离岸制度在不断壮大。当一个司法管辖区设计了一种全新的税收漏洞或秘密工具，从而成功地吸引流动资金时，其他司法管辖区会在“恶性竞争”中纷纷效仿，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便造成了企业平均税率大幅下降，从1985年的49%降至今天的24%，降幅达50%。对于美国跨国公司而言，据估算，转移至避税港的企业利润从20世纪90年代的大约5%—10%增长到今天的25%—30% (Cobham and Janský 2017)。

国际企业税制的原则是大约一个世纪前根据国际联盟的要求所制定的。这些原则将跨国企业定性为联系松散的“独立实体”。但这并非事实：实际上，作为一个整体，跨国公司享有巨大的优势，不仅拥有市场地位，还实现了规模效应。如果跨国公司的整体价值超过了其（设在不同地方的）各部分价值的总和，那么哪些国家应该针对超出的那部分价值征税呢？由于税制更看重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而总部通常位于富国，因此低收入国家很少能对其征税。

而且，跨国公司可操控这些关联公司间交易的转移价格，从而将利润从高收入司法管辖区转移到低收入司法管辖区。例如，一家企业的关联公司可能在低税收的避税港持有专利，但会向设在高税收国家的关联公司收取很高的品牌使用费，从而实现在低税收管辖区的利润最大化。从理论上讲，转移价格是反映两个非关联方之间的公平交易的主要市场价格。但这种价格通常难以确定，这就像是对一个不在公开市场上销售的蒸汽发动机的某个特殊部件估值，或是给一种药品专利估值一样。在实践中，价值往往是由公司的会计们确定的。

就“公平交易的独立实体”而言，主要的替代方案便是采用所谓的“公式分配法的单一税制”。这种税制根据能体现真实经济活动（其中可能包含销售、就业和有形资产）的公式，将跨国公司视为单一实体，并按地理区域来分配利润。从理论上讲，这种方法使得避税港失去了意义。如果

某公司在百慕大群岛设立只有一个人的办事处，那么根据该公式，其全球利润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分配到那里。在这种情况下，百慕大群岛是否按零利率向这部分利润征税基本上无足轻重。在实践中，这项税制还存在技术难题，而且公式的选择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它确实比现行的制度更简单、更公平、更合理。

的确，虽说限制性的地方性税制尚未在国际范围内使用，但美国的很多州、加拿大各省以及瑞士的很多州都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目前正在采取措施，要求跨国公司分解并发布其各国的财务和会计信息，这样便可为国际分配公式提供相关的数据。实现替代方案的过程中可能采用很多其他的渐进式方法，因此变革可能也是渐进式的，而不是革命性的。

大约十年前，政界很少对避税港的扩张采取限制措施。然而，经过2008年的那场危机后，各国政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要消除巨额的财政赤字，另一方面要安抚那些愤怒的选民，他们对由纳税人出资的银行救助计划、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跨国公司和富人逃税的行为感到不满。巴拿马文件泄密事件和卢森堡泄密丑闻让人们意识到，避税港经常服务于一些罪恶的目的，这让政府感到很大的压力，必须采取措施扭转这种局面。因此，作为国际税收事务的主要标准制定者的富国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布了两大计划。

一项计划是通用申报标准（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这项税制鼓励跨境财务信息的自动交换，从而帮助税务主管部门跟踪纳税人的离岸资产。但CRS存在很多漏洞，例如，它让那些持有真实护照的人士在避税港，而不是在他们居住的国家申请居住权。就地域而言，美国的漏洞更多：根据《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案》的规定，美国从海外收集有关美国纳税人的信息，但却很少向海外分享自己的信息，因此非永久居民可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在美国境内持有资产，

这样使美国成为主要的避税港。

然而，CRS产生了一定影响。根据经合组织2019年7月估算，90个国家共享了4700万个账户的信息，总额高达4.9万亿欧元。避税港的银行存款降低了20%—25%。申报前的自愿披露为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包括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增加了950亿欧元的税收收入。

另一个大型计划是针对跨国公司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项目。这是经合组织在“根据经济实质调整税收”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同时不影响国际社会对于公平交易原则（也是那些逃税的跨国公司及其同盟支持的原则）已形成的长期共识。虽然BEPS确实提高了跨国公司的透明度，但在经合组织看来，最终还是不大成功，尤其对数字化经济来说。

经过一段时间后，美国也认识到，在消费型经济中，有必要将征税权转向销售发生地。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哥伦比亚、加纳和印度）2016年实现了良好的开局，目前正在积极探寻新的方法。经合组织开始考虑仅涉及销售的公式，但某些低收入国家倾向于一种涉及员工和有形资产的公式，这种公式可使这些国家享有更大的征税权。这种偏离公平交易原则的做法显然更接近税收活动人士所要求的公式分配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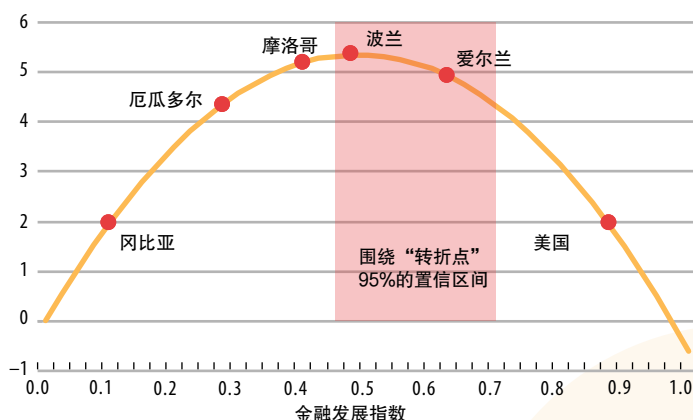
2019年1月，开始出现重大变化。经合组织首次公开承认，需要使用“超出公平交易原则的解决方案”。3月，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称这种方法是“过时的”，而且“对低收入国家尤其有害”。她敦促要进行“彻底的反思”，并采取逐步实现基于公式的收入分配方法。5月，经合组织发布了“路线图”，建议根据两个方面进行改革：第一，确定缴税地点及税基，以及征税的利润比例；第二，让跨国公司按最低税率缴税。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教授鲁文·艾维-约纳（Reuven Avi-Yonah）指出，这项计划“过于激进”，在5年前“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世纪以来国际企业税制最重要的变革时期。具体的进展将取决于权力斗争：国家之间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国家内

金融过度发展？

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已经过了金融行业的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阶段。

（对GDP增长率的影响，百分点）



资料来源：Sahay and others (2015)。数据于2019年7月更新。

部的、普通纳税人与从现行税制中获益的纳税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但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变革。税收正义联盟是我一直工作的单位。该组织目前认识到自身的四大核心要求。这些要求一开始被认为不切实际，可如今却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这四大核心要求包括跨境财务信息自动交换、金融资产受益所有人公开登记、国别报告以及采用公式分配法的单一税制。

而企业所得税不过是个起点。要想更全面地了解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考虑那些使离岸制度获得认可的因素。瑞士这个例子就很可能说明问题。过去几十年间，德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客们在银行机密方面与瑞士存在分歧，但鲜有胜绩。然而，2008年，在发现瑞士银行家帮助他们的美国客户逃税之后，司法部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它针对的不是某个国家，而是该国的银行家和银行。作为回应，那些危机四伏的个人参与者成为游说改革的主要力量。没过多久，瑞士第一次在银行机密方面做出了重大让步。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任何有效的国际响应必须包括对发挥推动作用的个人（包括会计和律师）实施强有力的制裁，尤其是当他们为逃税等犯罪活动提供便利时。

对于很多经济体而言，拥有一个离岸金融中心就是一项“双输”的主张。

从更深层面来看，我们不妨这样想一下：推动离岸制度的因素是不同司法管辖区在提供最佳的避税、信息披露和金融监管方式时存在的竞争关系。这种逐底竞争历来被视为一种需要多边协同解决方案的集体行动问题。而且合作方法存在缺陷。有些司法管辖区在吸引流动资金时总想着做手脚，因此集体行动可能就像是在蹦床上养松鼠。而且，动员选民支持复杂的跨境协作并非易事，尤其是当目标是帮助外国人或低收入国家时。

这里存在一种截然不同、却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问题是，避税港吸引的资金流对流入国有利吗？这些资金流当然有利于当地的利益集团，通常包括银行、会计、法律和房地产等领域，但会让整个司法管辖区受益吗？

IMF、国际清算银行和其他相关方不断开展的一系列全新研究表明，答案是否定的。“金融过度发展”这篇文献认为，金融行业发展在达到一个最优点之前是有益的，而在此之后，该行业的发展会开始损害经济增长（见上一頁的图）。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英国和其他主要的避税港，早已过了这个最佳时机。对这些国家来说，压缩金融行业的规模来消除不利的金融活动可能会促进经济繁荣。

除了这项研究之外，英国避税港泽西岛的前任经济顾问约翰·克里斯坦森（John Christensen）和我提出了“金融诅咒”这个概念。“金融诅咒”会危害那些金融行业规模过大的司法管辖区，类似于困扰那些倚重石油等商品的国家的“资源诅咒”一样。这种“富饶的贫困”悖论有多个诱因：掌握熟练技能的人才流失，从政府、工业和公民社会流向高薪的支柱部门；支柱部门和其他部门间日益扩大且破坏增长的不平等状况；本地价格上涨造成其他贸易品行业与进口产品相比缺乏竞争力；商品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反复涨跌；在低息贷款流入时，以富有成效、创造财富的活动为代价，寻租和创业精神的丧失日趋严重。有些学者还强

烈批评“经济金融化”趋势，或者说从创造财富的活动转向更具掠夺性的、榨取财富的活动，如垄断化、大到不能倒的银行以及利用避税港。

随着秘而不宣的资金向西方的政治体制渗透，那些寻求保密或逃避企业所得税的资金流似乎可能正是加剧金融诅咒、造成贫富严重不均、不断增大危机风险，以及无法衡量政治损失的因素。当金融资金流从较穷的国家向富国的避税港流动时，随之出现的是劳动力的迁移。

像往常一样，对这个方面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然而，对于很多经济体而言，拥有离岸金融中心其实是一个“双输”的主张：它不仅将危害向外传导给其他国家，而且会将危害向内传导给所在国。那些认识到这种危险的国家可以采取单边行动，努力管控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这些国家所要做的就是摆脱逐底竞争并遏制避税港活动，同时提高本国公民的福祉。这是一种有效的制胜公式。FD

尼古拉斯·萨克斯森（NICHOLAS SHAXSON）是《毒油井》《金银岛》以及最近的《金融诅咒》的作者。这些书分别探讨的是西非的资源诅咒、避税港和金融行业规模过大的国家。

参考文献：

- Cobham, Alex, and Petr Janský. 2017. "Measuring Misalignment: The Location of US Multinationals' Economic Activity versus the Location of their Profits."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37 (1): 91–110.
- . 2018. "Global Distribution of Revenue Loss from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Re-Estimation and Country Resul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0 (2): 206–32.
- Crivelli, Ernesto, Ruud A. de Mooij, and Michael Keen. 2015. "Base Erosion, Profit Shifting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MF Working Paper 15/11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Henry, James S. 2016. "Taxing Tax Havens." *Foreign Affairs*, April 12.
- Sahay, Ratna, and others. 2015. "Rethinking Financial Deepening."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5/0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Zucman, Gabriel. 2017. "How Corporations and the Wealthy Evade Taxe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0.



影子投资的 兴起

避税天堂的空壳公司破坏了发达、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
税收管理

扬尼克·达姆加德、托马斯·埃尔克亚、尼尔斯·约翰内森

“双层爱尔兰夹荷兰三明治”

根据官方统计，作为一个拥有 60 万人口的国家，卢森堡所拥有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比肩美国，远远超过中国。卢森堡的外国直接投资达 4 万亿美元，相当于人均 660 万美元。这种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很难反映出对卢森堡这个微不足道的经济体的实体投资。那么，是官方统计数据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另有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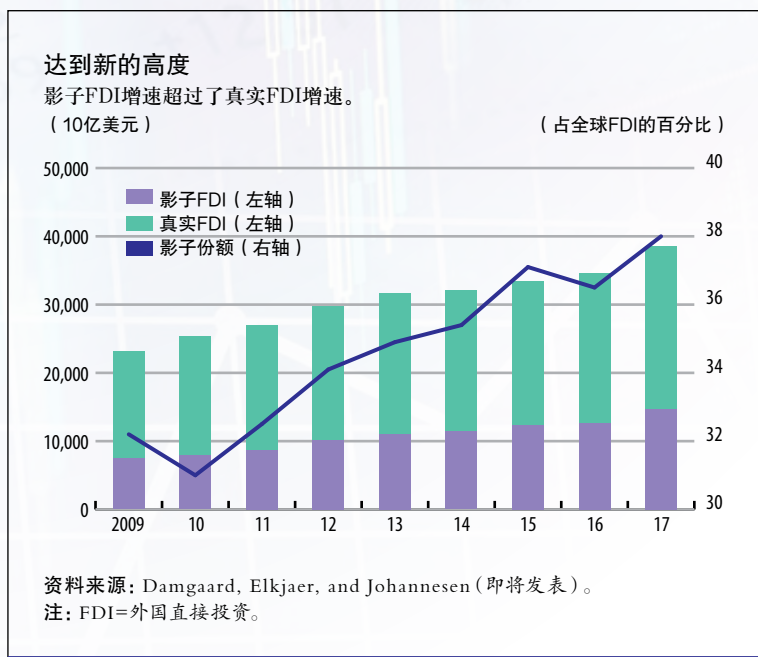
外国直接投资往往是真正的国家间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通过资本、技能和技术的转移来刺激增长、创造就业以及提高生产力。因此，许多国家都有吸引更多资本、技能和技术的政策。然而，并非所有的外国直接投资都能带来资本，以实现生产力的提高。在实践中，外国直接投资被定义为属于同一跨国集团的公司之间的跨境金融投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空壳公司进行的影子投资。这些空壳公司也称为特殊目的实体，没有实际的业务活动。相反，它们开展控股活动，进行内部融资，或管理无形资产——通常是为了将跨国公司的全球税单降至最低。这种金融和税收设计使传统的外国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变得模糊，让人难以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经济一体化。

要了解在哪里、由谁，以及为什么 40 万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正在流向世界各地，需要更好地借助于数据。一项新研究 (Damgaard, Elkjaer, and Johannesen, 即将发布) 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详细外国直接投资数据与 IMF 的协同直接投资调查的全球覆盖范围相结合，创建了一个涵盖所有双边投资关系的全球网络，以便将虚假的外国直接投资与真实的外国直接投资分开。

有趣的是，全球虚假外国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来自一些知名的避税天堂，卢森堡和荷兰占据了近一半。如果把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群岛、新加坡、开曼群岛、瑞士、爱尔兰和毛里求斯也包括在内，这 10 个经济体的影子投资占所有影子投资的 85% 以上。

为什么这几个避税天堂吸引了这么多的影子外国直接投资呢？它们是如何吸引的？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策略，通过提供利润丰厚的收益来吸引尽可能多的外国投资，比如非常低或为零的实际企业税率。即使这些空壳公司在东道国经济体中没有或只有很少的雇员，也不缴纳企业所得税，但它们仍然通过购买税务咨询、会计和其他金融服务，以及支付注册费和公司注册成立费，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对于加勒比地区的避税天堂而言，这些服务和旅游业一起占据着 GDP 的主要份额。

在爱尔兰，公司税率已经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 50% 大幅下降至今天的 12.5%。此外，一些跨国公司利用爱尔兰法律漏洞，采用美其名曰“双层爱尔兰夹荷兰三明治”的新型税收设计技术，在爱尔兰和荷兰子公司之间进行利润转移。他们通常选择加勒比地区的避税天堂来避税。这些策略甚至实现了更低的税率或者完全避税的目的。尽管实施了减税措施，爱尔兰企业所得税收入占 GDP 的份额仍在上升，因为该国的税基已大幅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外国投资的流入。这种策略可能对爱尔兰有帮助，但它侵蚀了其他



全球虚假FDI的绝大部分来自一些知名的避税天堂。

经济体的税基。全球平均公司税税率从1990年的40%下调至2017年的25%左右，这是一场逐底竞争，国际协调不可或缺。

在全球范围内，影子投资达到了惊人的15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和德国的年度GDP总和。尽管国际社会有针对性地试图遏制避税行为——通常的做法是遵循知名的二十国集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倡议，以及在通用申报标准（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范围内自动交换银行账户信息——但影子外国直接投资仍在飙升，且增速超过真实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影子外国直接投资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从30%左右攀升至近40%（见图）。这种增长是外国直接投资所特有的。莱恩（Lane）和米莱西·费雷蒂（Milesi-Ferretti）（2018）认为，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头寸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GDP的增长速度，而投资组合工具和其他投资的跨境头寸则没有增长。

尽管影子外国直接投资以少数几个避税天堂为主，但几乎所有经济体都暴露在这种现象之下，包括发达、新兴市场、低收入和发展中经济体。多数经济体大量投资于海外空壳公司，并从这些实体获得大量投资，其平均投资水平都超过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5%。

对外国空壳公司的投资表明，由国内控制的跨国公司可能从事避税活动。同样，来自外国空壳公司的投资表明，外资控股的跨国公司试图在东道国避税。一个经济体对影子外国直接投资的风险敞口会随着企业税率的提高而增加，这毫不奇怪。

为更好的政策提供更好的数据

全球化给宏观经济统计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今，跨国公司可以利用金融工程将大笔资金转移到全球各地，轻松转移高利润的无形资产，或者在没有实体业务的情况下，从避税天堂出售数字

服务。这些现象会对传统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产生巨大的影响，如避税天堂的GDP和外国直接投资数据出现虚高。比较有名的例子包括2015年爱尔兰GDP增长26%，因为此前一些跨国公司将知识产权转移到爱尔兰，而卢森堡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之一。为了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获得更好的数据，经济统计数据也需要进行调整。

新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网络有助于确定哪些经济体进行影子投资和实际投资，并能更清楚地了解全球化模式。这些数据为分析人士提供了更深入的洞见，并能指导政策制定者应对国际税收竞争。

近年来，税收议程在二十国集团经济体中得到了推动。BEPS和CRS倡议是国际社会努力解决具有百年历史的税收设计缺陷的示例，但税收竞争和税收权利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解决。然而，这种情况似乎正在发生变化，人们普遍认为有必要进行重大改革。事实上，今年IMF为修订后的国际税收体系提出了多种替代方案，从最低税率到向目标经济体分配税收权利。无论决策者选择哪条道路，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国际合作是解决税收问题的关键。FD

扬尼克·达姆加德（JANNICK DAMGAARD）目前是IMF北欧-波罗的海执行董事办公室执行董事的顾问。这些研究大多是在他之前担任丹麦国家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时完成的。托马斯·埃尔克亚（THOMAS ELKJAER）是IMF统计部高级经济学家，尼尔斯·约翰内森（NIELS JOHANNESSEN）是哥本哈根大学经济行为与不平等中心的经济学教授。

参考文献：

Damgaard, Jannick, Thomas Elkjaer, and Niels Johannesen. Forthcoming. "What Is Real and What Is Not in the Global FDI Network?" IMF Working Pape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Lane, Philip R., and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2018. "The 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MF Economic Review* 66 (1): 189–222.

征税时代

希腊税务机构负责人的任务是努力提高国民的税收合规意识

玛丽亚·彼得拉基斯

此时正值希腊的炎炎夏日，雅典到处都是前来观光的游客。在雅典卫城脚下古老的普拉卡区，狭窄的鹅卵石小巷两边的店铺里挤满了穿着短裤和凉鞋的游客。他们在店里挑选橄榄、冰箱贴、T恤衫和其他小首饰。其中一个男士为了一个手提包的价钱跟街头小贩讨价还价。这正是希腊的首席税务官乔治·皮特西里斯 (George Pitsilis) 在努力根除的那种现金交易。

如果今年到访的游客人数与去年持平，那么将有大约 3000 万游客来到希腊。他们会购买希腊的咖啡和沙拉，租用汽车和沙滩遮阳伞。他们将带来 160 亿欧元的旅游收入，给这个国家萎靡的经济增添一丝活力。首席税收官皮特西里斯决定要确保对这些交易能征收增值税，毕竟对于这个现金短缺的国家来说，增值税是收入的重要来源。

依据法律的规定，零售商和其他服务提供商有义务接受信用卡、借记卡和预付卡，同时提供收据。但面对 24% 的增值税，这也是欧洲最高的增值税，商家难免不会捣鬼。

因此，希腊的税收管理部门发起了一项名为“请给我收据”的宣传活动，旨在鼓励游客在消费时使用银行卡并索要收据。皮特西里斯还下令对企业进行税收稽查，毫不犹豫地关停了米克诺斯岛上那些不提供收据的知名餐厅。这项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雅典街道上的游客。



照片: ISTOCK/HOLOGS



左：希腊公共收入独立管理局局长乔治·皮特西里斯。右：雅典的一位店主在开收据。



照片：MICHAELS KARAGANNIS

“这样增强了公众的意识，传递了一种信息。”皮特西里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游客可以“为帮助我国的经济复苏尽一份力”。

不断膨胀的赤字

逃税是希腊这个国家面临的特殊问题。在征税方面，希腊远远落后于欧盟其他成员国。结果，希腊的税率过高，适用人群太窄。2009年，希腊的预算赤字大幅攀升，超过了GDP的15%以上。

要想降低税率，并有足够的资金来加强社会安全网和增加公共投资，关键就是要提高合规性。在长达八年的经济危机中，希腊的GDP下降了25%，国际救助资金达2890亿欧元。而这一切有利于希腊从这场危机中走出来。

危机开始时，希腊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据估算，希腊的影子经济或者地下经济最高能占GDP的27%，这在整个欧洲是最高的。据IMF的一项研究估算，大约75%的个体经营户申报的收入低于个税起征点。税收征管制度严重落伍，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腐败问题普遍存在。税码不停变更。希腊程序缓慢的法庭体系中各种争议纠缠不清。

试图伪造政府财政数据的做法并不能掩盖问题。2010年，作为一揽子紧急援助计划的组成部分，希腊承诺将大幅度降低其庞大的财政赤字。但是，随着希腊深陷金融危机，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变得更困难了。随后便是更多的救助计划。2015年，为了避免国内银行系统崩溃，希腊实施了资金管控，其中包括每天从自动提款机提取现金的最高额度。

这些加强税收征管的努力未达到预期效果，自此，希腊政府成立了公共收入独立管理局，旨在确

保税收管理不会受到政治压力的干扰，也可以摆脱那些长期困扰希腊官僚机构的复杂的劳动法规。44岁的皮特西里斯是一位律师，他在美国出生，在希腊长大，在希腊和法国求学。2017年1月1日，在公共收入独立管理局成立后，他出任第一任局长。

皮特西里斯在雅典闹市区毫无特色的财政部大楼的八楼办公室里工作。公共收入独立管理局设有一个单独的入口，这样便可与财政部的官员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最近一个周五的下午五点，他开完会回到办公室，系好领带，重新开始工作。他一天的工作通常在晚上9点半结束。

5月的某一天，在政府宣布议会选举提前于夏季举行后，皮特西里斯召集员工开会并发布了一条消息：对他们来说，一切工作照常进行。税收征管工作不能有丝毫放松。他们不能像过去那样，税收征管人员放下手头的工作，帮助政府去讨好选民。

无人侦察机

在今年暑季，税收稽查员正在开展50500次现场税收稽查。无人侦察机在圣托里尼岛的上空盘旋，确保那些来观看这座岛上充满海水的火山口的游客能收到游船运营商的收据。对于那些在日常交易中使用预付卡的纳税人，每月一次的抽奖将给予他们获得1000欧元奖金的机会。

另外，更多普通的创新举措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税收官员更容易获得第三方信息，例如银行账户，而且争议解决制度能更快速地解决投诉问题。海关部门的流动工作队在陆地和海上工作，开展随机检查。目前，这些流动工作队由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管理。这个特殊部门将重点调查三个部门：大企业、小公司和个体经营户，以及高净值人士。

“逃税可不是一块铁板。”皮特西里斯说，“它有很多形式。显然，并不存在‘一刀切’的方法。”

然而，很显然，作为这项全新的“请给我收据”宣传活动的出发点，销售点终端机的快速增长成为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的关键。希腊最大的银行卡受理网络的运营商 Cardlink 指出，在截至 2018 年 12 月的两年间，终端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接近 70 万台。交易价值从 190 亿欧元激增至 315 亿欧元。

现金限额

银行卡的突然大热恰逢 2015 年政府着手实施资金管控。当时，希腊人纷纷使用借记卡来购买汽油和日用百货，以此来应对现金取款限额。接着，政府要求多个职业部门和企业使用终端机。

随着销售点终端机的使用激增，增值税的收据也大幅增加。这是因为可自动完成收款。希腊的智库经济与工业研究基金会 (IOBE) 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在 2017 年的增值税收入中，电子支付至少占增幅的一半。

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2018 年，电子支付额增长 24%，高达 310 亿欧元，从而推动了增值税的征收。增值税占政府税收收入的 1/3。通过节流和增收，希腊去年实现的预算盈余占 GDP 的 1.1%。相比之下，2010 年的预算赤字占 GDP 的 11.2%。

电子支付“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这是因为它们给个人带来了好处”，皮特西里斯说，“这样可以让人人能够避免讨价还价，让他们有机会说‘我想刷卡’”。

即便如此，希腊要获得更多的实惠仍有很大的空间。IOBE 指出，2017 年，希腊银行卡的使用在私人消费中的占比为 14.8 个百分点，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该机构还表示，要是希腊达到了欧盟的平均水平，那么年增值税收入将达到 21%，超过 33 亿欧元。

随着希腊放松资金管控和现金取款限制，人们担心目前仍然薄弱的税收遵从问题会雪上加霜。Cardlink 的代表们在今年年初的一次会议上讲到，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安装的终端机中有 1/4 一直处于停机状态。

其中一个原因是：不同于希腊的年轻人和城

市里的人，希腊的老人和生活在乡村的人仍然喜欢用现金。那些个体经营户通常会给现金付款的顾客打折。在私密的医生办公室或律师事务所，双方更容易达成这种约定。欧洲统计局指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毕竟个体经营户占到希腊劳动力的接近 30%，是欧盟各国比例最高的，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因此，税负主要由便于征税的领薪雇员和养老金的人来承担，而相对富有的个体经营户却逃避了税费。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 (Kyriakos Mitsotakis) 在 7 月份的大选中获胜。他竞选时承诺要减轻税负，这正是他当选的一个原因。

“税收不能只是收入的来源，它必须逐渐成为增长的杠杆。”米佐塔基斯在议会的首次政策演讲中说道。他宣布降低财产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他表示，电子付款以及强制性电子发票和记账将扩大税基。

态度发生转变

对于像利亚斯·琴加斯 (Ilias Tsingas) 这样靠海外游客赚钱的店主来说，电子交易必不可少。“游客不使用现金。”他说。

57 岁的琴加斯在雅典市中心经营着一家小卖部。那里距议会大厦仅有几分钟的路程，位于总统卫队成员行进的路线上。总统卫队全副武装，经过一段路程后，站在无名战士纪念碑外警戒。他的小卖部出售各种商品，从纸巾到塑料足球。小卖部装饰着各种英文标牌，声称接受借记卡和信用卡。但是，他说，希腊人中只有政治家和公务员才会经常使用终端机，毕竟他们要证明费用的合法性。

对于皮特西里斯来说，转变态度是成功的关键。他说，希腊人现在要培养个人责任感，抵制住折扣的诱惑。避免使用现金付款获得折扣而逃税。

“我们大家都有责任认识到，这种想法会危害我们的未来、我们孩子的未来、我们的养老金，并且影响我们的孩子或孙辈未来能否找到工作。”皮特西里斯指出，“因为，最终，我们都要付出代价。”^[D]

玛丽亚·彼得拉基斯 (MARIA PETRAKIS) 是雅典的一名自由记者。



隐私与透明

在打击非法资金流时，各国必须实现适当的平衡

杰伊·珀塞尔、伊凡娜·罗西

2011年，巴基斯坦的财政部长向国民议会做预算报告，该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为9.2%，低于154个司法管辖区，这一比例仅比一个司法管辖区高。在这个拥有1.8亿人口的国家，只有120万人和企业提交了所得税申报表。

普遍存在的逃税问题发端于高层。巴基斯坦的调查报道中心发现，该国70%的议员都未提交当年的所得税申报表。因此，加强现行法律和惩罚措施是一种挑战。要想不断强化执法工作，这最终取决于巴基斯坦法官的行动，但很多法官对

纳税工作也不够重视。

财政部并没有退缩，而是迈出了大胆的一步。2014年，财政部授权联邦税收委员会公布每个公司和个人每年缴纳的所得税金额。这种非同寻常的方法似乎已经发挥了作用。虽然依法纳税的比例仍较低，但有证据表明，由于财政部开展的透明度活动，纳税比例有所提高。然而，这种积极的变化是有代价的。为了使逃税者碍于面子而不得不缴纳自己的那份税费，同时在拒不缴税的情况下，让公民社会和记者追究他们的责任，所有的巴基斯坦人

尽管提高透明度的好处很多，但有些国家仍不愿对外披露有价值的信息。

必须放弃自己的部分隐私。

在世界范围内，各国主管部门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通过提高透明度来打击非法资金流的意义和代价。透明度的实现离不开执法，需要提高流程和机构的问责制和信任，并通过提高检查风险来制止不法行为。然而，对于那些有合法理由来保证自己的金融交易不对外公开的人来说，这样会让它们失去一些隐私，例如担心爱管闲事的邻居、八卦记者，甚至是绑架犯。

但在探讨这种解决方案带来的协调关系时，我们不妨先搞清楚这个问题。“非法资金流”是一个概括性术语。这个术语一般被认为至少涵盖三方面的内容。首先，通过非法手段（如腐败、走私和贩毒）获得的资金。其次，转账构成违法行为的资金，如为了向政府主管部门隐瞒收入而转移资金的行为构成了逃税，即使这种收入是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最后，用于非法目的的资金，如资助恐怖主义。

即便各国仍在努力完善这种强大工具的使用，可转而通过提高透明度来阻止资金流，这其实并不是个新想法。下面的一些例子说明了如何管控由此产生的失去隐私的一系列方法，这是一种公认的、复杂但却至关重要的成功要素。

官员的信息披露

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超过 90% 的国家制定了法律，要求至少部分政府官员应披露自己的财务状况。然而，具体要求和执行效果却差别很大。大部分情况下，官员们必须披露自己或直系亲属（比如配偶）在本国或境外的所有收入、资产和负债。在其他情况下，他们还必须披露自己作为最终或“受益”所有人的资产状况。这种披露有助于推动多

个反腐目标的实现，从预防到落实，也有利于打击洗钱犯罪。例如，有利于确定某个客户是否属于政治公众人物、促进客户尽职调查程序或者推动资产追踪和追回工作。

在现代的互联网用语中，让公众有权掌握披露的财务信息无疑是极为难得的众包机会。监管机构、新闻记者和其他各方与专职的公务员一起监督申报工作，经常会获得一些线索和发现，从而推动或加强重要的反腐调查。例如，2009 年，克罗地亚总理在媒体对其个人财富的来源提出质疑后，不得不宣布辞职。这些媒体报道的导火索是几张照片，这些照片显示，他带的一些价格不菲的手表并未出现在他申报的财产清单上。同样，正是媒体界人士发现，法国预算部长未向政府财政部门申报自己在瑞士银行的多个账户。这个丑闻不仅促使政府部门启动调查，最终导致这位部长因税务欺诈和洗钱而被定罪，而且促使法国全面改革本国官员的资产申报制度，并首次将公众知情权纳入其中。简而言之，公众知情权可提高问责，强化信息披露对发现和起诉腐败行为的影响。

尽管提高透明度的好处很多，但有些国家仍不愿对外披露有价值的信息。在要求信息披露的国家中，仅有大约一半的国家依法规定了公众知情权，而极少有国家真的会授予公众知情权。保护隐私是一种常见的原因，另一个担心的问题是，披露的信息可能会落入潜在的小偷或绑架犯的手里。但是，妥善处理这些顾虑与公众知情权的利益之间的关系，这完全是有可能办到的事情。下面是一些值得考虑的方面：

- 公众知情权未必是指发布官员提交的申报资料的全部内容。一些极其敏感的信息可保密，如银行账号。

● 各国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公众知情权的方式。比如，仅对高级官员的申报信息进行披露。

●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包括在判例制度中，对于高级官员而言，公众利益比个人隐私更重要。

受益所有权

披露公司和其他法人（如信托机构）的所有者的身份是打击非法资金流的另一种方式。据达姆加德、埃尔克亚和约翰内森（Damgaard, Elkjaer and Johannesen, 2018）开展的研究估算，通过无实际经济活动的空壳公司转移的非法资金流占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约40%，总额达12万亿美元（见本期《金融与发展》，“影子投资的兴起”）。虽然这些资金流未必都是非法的，但对于实际拥有、控制或受益于这些机构的人员（所谓的“受益所有人”）的信息不足，结果会导致可疑交易的发生。

为了遏制非法资金流，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FT）发布的国际反洗钱标准包含了有关提高法人及其受益所有权的透明度的具体建议。通常在公司登记册中包含的基本信息都应该向公众披露，如公司名称、公司类型、法律地位、地址以及董事名单。无论受益所有权信息是由注册处、金融机构或是公司本身持有，司法主管机关都一直有权获得这种信息。根据FAFT标准，其他重要的国际组织，包括二十国集团以及经合组织的全球论坛，也将工作重心放在提高受益所有权的透明度上。

然而，有些人不断假借匿名公司之名干着非法的勾当，这种现象促使公众要求政府加大力度，公开披露受益所有权信息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注意到公众的这些呼声后，欧盟决定各成员国必须在2020年之前建立公开披露的受益所有权登记册。

公众知情权有很多好处。它支持金融机构对客户进行尽职调查，还有利于公众监督和分析政府部门采购商品和服务的行为（例如，了解承包商是否与官员有一定关系），检查官员披露的财务信息，同时更好地核实登记册中的信息是否准确和及时。

有些国家（包括英国和丹麦）正在率先建立公共受益所有权登记册。其他很多国家也致力于建立这样的登记册。在处理有关隐私的关切时，要想将透明度和公开数据放在首位，就应充分考虑以下方面：提供充分的信息来识别受益所有者，而不是提供无价值的信息，同时要建立有效的方式，要求根据具体情况豁免公开信息，如有证据表明存在严重的暴力或恐吓的风险时。

对特定地区的责令

房地产的买卖活动可能是转移、洗白和投资非法所得的一种极其有效的方式。原因显而易见：在一次交易中洗白或投资大笔资金，同时通过使用法人途径来掩盖受益所有人的身份，这通常是可行的。这种风险未能逃过国家政府机构的目光，尤其是那些地产市场规模大、开放程度高、房价飞速上涨的国家。

为了应对这种风险，美国财政部使用了一种工具，即对特定地区责令。2016年初，财政部下属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简称FinCEN）发布了临时命令，要求“美国一些产权保险公司提供那些为纽约和佛罗里达部分地区的高端住宅项目支付‘全部现金’的公司背后的自然人”。这样做的目的是揭开那些借空壳公司和其他法人之名，用现金购买豪华地产项目背后的神秘面纱。当然，正如秘密可以掩盖非法行为人的罪行一样，秘密也可保护那些合法行为人的隐私。其中，有些受影响的房主可能是名流或者其他希望保持一定隐私的公众人物，但还有些房主可能是那些企图将自己的非法交易从执法活动中掩盖起来的罪犯。

在其他国家，FinCEN的这种解决方案可能由土地注册局实施，但需要将受益所有权信息提供给政府，而不是公众。这意味着，美国（和外国相关）主管部门可获得这种敏感数据，而潜在的追踪者、律师和抗议者却没有这种权利。2017年，FinCEN表明，根据其特定地区报告指令，超过30%的购买活动是由那些被怀疑参与可疑交易的人员开展

这二者之间的权衡取舍是可以得到管控的，也是应该被加以管控的，但不可将其作为对非法资金流不作为的借口。

的。同时，FinCEN 一直在修改这项指令，在不过分牺牲买方隐私的情况下，将命令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其他大都市区。

纳税记录

据英国税收正义联盟 2011 年的估算，逃税行为让政府每年损失的收入超过 3 万亿美元。由于税收收入减少，那些用于积极建设方面（例如，修建公路、学校和医院）的资源也随之减少，而政府也很难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各国政府持续努力打击逃税犯罪，包括对纳税申报单进行审计以及与其他国家交换相关信息。

在加强税收合规方面，有一种很少使用的方法是公开纳税人的收入和申报单。事实上，至少从 1863 年开始，挪威就已经这样做了。150 年后，巴基斯坦也开始这样做，但程度上稍差一些。毫无疑问，这些一直被作为增强透明度、平等和问责的措施也被批评是侵犯了隐私，既让同事和邻居心生嫉妒，也让他们更想“打探别人的工资”。事实上，芬兰政府于 11 月 1 日公布了公民的收入和纳税情况，这一天也成为所谓的“全国嫉妒日”。

为了更好地应对有关隐私的问题，挪威要求民众登录一个专门跟踪他们搜索结果的系统。纳税人会发现哪些人浏览过自己的信息。该系统的用户每个月最多只能搜索 500 条记录。瑞典也开展了类似的管控。这些措施意在更好地保持透明度和隐私之间的平衡，目前已经取得了预期的结果。在管控措施实施后，有关纳税记录的一些毫无意义的要求似乎有所下滑。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更好地保护公众利益，有些能匿名搜索的媒体界人士持续发挥着重要的调查作用。

强大的武器

这些例子说明，在打击非法资金流的战役中，透明度是一个强大的武器。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因为透明度能使新闻记者、学者和其他人对大量的数据进行仔细审查，同时举报可能存在的违法活动。透明度也有利于增强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并强化问责制，弱化民众对公共部门存在腐败问题的看法。然而，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对有关隐私的问题视而不见。如果无法妥善处理这个问题，那么会使强烈反对透明度倡议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反对者包括那些一番好意的活动家，也包括那些愤世嫉俗的人士，他们可能以隐私为借口，掩盖可疑交易。

如何使透明度和隐私完美地统一起来，并没有通用的公式。然而，目前有一些国际标准和普通适用的做法来指导这项工作。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必须有权使用完整的信息，努力降低公众获取信息的门槛，思考如何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提出不同的信息获取资格，保护某些个人隐私，防止毫无价值的搜索或商业化的数据挖掘。

这二者之间的权衡取舍是可以得到管控的，也是应该被加以管控的，但不可将其作为对非法资金流不作为的借口。FD

杰伊·珀塞尔（JAY PURCELL）和伊凡娜·罗西（IVANA ROSSI）都是IMF法律部的金融部门专家。

参考文献：

Damgaard, Jannick, Thomas Elkjaer, and Niels Johannesen. 2018. "Piercing the Veil." *Finance & Development* 55 (2).

暗网的真相

暗网的初衷是保护异见人士，但它同时也掩盖了诸多非法活动

阿迪蒂·库马尔、埃里克·罗森巴赫

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国防部的两家研究机构开发了一种匿名的加密网络，以保护美国间谍在交流时收发的敏感信息。普通的互联网用户无法知晓或访问这个秘密网络。尽管我们没办法充分理解这其中不可告人的初衷，但有些研究人员却从中发现了不同的价值主张——组建非营利组织，专注于以匿名形式保护人权和隐私活动。

考虑到保护流动信息的多层加密，需要登录Tor（全称“洋葱路由”）网络。Tor处于互联网的边缘，是暗网的底层技术。这里的暗网是指普通浏览器无法访问、谷歌等搜索引擎无法索引的一些隐秘网站。要解开网络中这个专注于隐私的秘密角落，唯一的方法是免费下载Tor浏览器。然而，完全匿名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事实上，暗网除了能高度保护隐私，以摆脱独裁政府的监视之外，还催生了一个日益庞大的

地下市场，在那里，惯犯可以进行贩毒、盗用身份、儿童色情以及提供非法产品和服务等犯罪活动。由于无法追踪的加密货币是主要的支付方式，要想加强对犯罪活动的管控，全球执法机关、金融机构和监管机关需要紧密合作。

灰色地带

如今，Tor网络上存在65000多个以.onion结尾的独特的URL（统一资源定位符）。2018年，计算机安全公司Hyperion Gray开展了一项研究，对其中10%的网址进行了编目，发现其中最常见的功能都是通过论坛、聊天室、文件和图贴（image hosts），以及依托市场的商务活动来推动的。这些功能性角色——尤其是与交流有关的角色——在自由社会中有诸多合理且合法的用途。而且，2016年，一家名为Terbium Labs的研究公司在其研究中



对随机选择的 400 个 .onion 网址进行了分析。这项研究表明，暗网中超过一半的网址都是合法的。

对于生活在压制性政权下的普通民众而言，由于这一政权屏蔽了许多互联网网址，或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因此暗网便成为他们的一丝希望，让他们能够获得信息并免遭迫害。在更为自由的社会，暗网可能是重要的举报和沟通工具，使人们在职场或社区不会遭到惩罚或评判。或者，对于那些担心企业和政府跟踪、使用并有可能买卖个人数据的人而言，暗网能够确保隐私和匿名性。如今，许多组织在 Tor 都有隐藏的网址，比如几乎所有的主流报刊机构、脸书，甚至美国中情局 (CIA)。这是因为 Tor 网站体现了对隐私的尊重，虽然有时只是象征性的。例如，《纽约时报》和中情局都希望更加有效地推动与虚拟的且能提供敏感信息的不速之客之间的交流。

另一方面，隐私和匿名性可保护人们不受暴政和精准广告的影响，这也使得暗网成为犯罪的跳板。一些比较普遍的非法活动包括武器走私、毒品交易、剥削性内容的分享，而且经常会涉及儿童，例如色情和暴力图片以及其他虐待儿童的事件。这些网站还支持新纳粹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及其他

对于生活在压制性政权下的普通民众而言，由于这一政权屏蔽了许多互联网网址，或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因此暗网便成为他们的一丝希望。

极端团体的言论。

一旦暗网服务与虚拟货币勾结起来，预计犯罪活动将大幅增加。十年前，一位化名中本聪的密码学专家（他在破解密码方面很有一套）开发了世界上首个不受国家政府监管的货币和支付网络：比特币。最初，比特币仅是科技界内使用的交换媒介。2011 年，比特币成为在“丝绸之路”这个暗网上从事非法交易的毒品贩子使用的货币。过去五年间，那些隐藏在大多数人视线之外的加密网络与执法官员几乎无法追踪的交易货币相互勾连，最终形成了一个规模小但影响大的市场——非法商人销售非法商品的市场。

在 Terbium Labs 列明的近 200 个非法域名中，75% 以上是交易市场。在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



当今社会所面临的诸多破坏性威胁均受到Tor网络的保护，国际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执法机关应给予关注。

(例如，门罗币)的推动下，这类市场快速发展。娱乐和医药是最受欢迎的产品，其次是盗用或欺诈性身份文件，例如身份证、信用卡和银行资信证明，有些网站还提供黑客和技术犯罪服务，包括恶意软件、分布式阻断服务攻击以及雇用黑客。除了这类产品外，很多此类网站还出售其他产品，包括色情和假冒商品。

尽管在暗网上进行的非法交易迅速增长且有具有相当的严重性，应引起各国政府和全球金融机构的关注，但与全球非法商业活动相比，在暗网上交易的商品总量仍微不足道。世界领先的加密货币支付分析公司 Chainalysis 最近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暗网上的比特币交易从 2012 年的大约 2.5 亿美元增至 2018 年的 8.72 亿美元。该公司预测，暗网上的比特币交易将在 2019 年超过 10 亿美元。如果该预测正确的话，则表明该领域的非法交易将达到历史新高。这份报告同时指出，非法比特币交易的占比一直在下滑，2012 年为 6%，而如今的比例不足所有比特币交易的 1%。更广泛地讲，据联合国估计，全球每年的洗钱金额占全球 GDP 的 2%—5%，介于 1.6 万亿美元至 4 万亿美元之间。

尽管从经济体量而言，非法的暗网活动规模仍相对较小，但是，当今社会所面临的诸多破坏

性威胁均受到 Tor 网络的保护，这亟需引起国际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执法机关的关注。

暗网监管

在保护持不同政见者、隐私提倡者及举报者的同时，不应纵容虐童者、武器贩卖者和毒枭。这给监管机构和执法机关带来了挑战：制定双管齐下的方法迫在眉睫，既能在信息管控时代保护自由主义原则，同时能发现并根除暗网上最隐秘的活动。过去几年间，国际社会通过完善信息共享、提高执法机关打击主要非法市场的技术能力以及规范加密货币交易的转移，在应对这些挑战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要打击暗网上那些最邪恶的活动，首先要加强执法机关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暗网的全球性使得国际合作势在必行。2018—2019 年，国际刑警组织和欧盟联合 12 个国家的执法机关，锁定了 247 个重要的嫌疑目标，并共享了执法所必要的运营情报。此举的成果令人期待：就在今年，该团队的成员成功逮捕了犯罪嫌疑人，并关闭了 50 个非法暗网网址，包括全球最大的两个贩毒市场——华尔街和瓦尔哈拉。

非法暗网交易的蔓延也促使世界各国政府积极加强国内执法部门——例如，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能力，努力打击各类犯罪活动。例如，据报告，FBI 开展了一系列行动，使 Tor 服务器“去匿名化”。FBI 在网络上建立节点，借此来发现非法 Tor 网页的网络号和位置。FBI 第一项重大行动就是捣毁“丝绸之路 2.0”（Silk Road 2.0）网站，这是 2014 年上线的最具影响力的非法暗网市场之一。FBI 的调查显示，在该网站非法运营的两年半中，几千名毒品贩子和其他非法商人通过该网站向 10 万多名客户出售了数百公斤的毒品和其他非法商品及服务。该网站还被用来进行洗钱，从这些非法交易中获得的黑钱达数亿美元。总之，按比特币计算，该网站当时的总销售收入超过了 9500 万美元，约合 12 亿美元。继“丝绸之路”后，2017 年两个最大的市场——AlphaBay 和 Hansa——被成功捣毁。

针对暗网的执法能力正在不断增强。近期，在荷兰的一次执法行动中，执法人员对一家知名的暗网商户匿名追踪了一个月，最后将其成功取缔，接着又利用所收集的信息取缔了其他几十个暗网商户。

建设新的法规势在必行

除了开展打击行动外，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正在设法对那些助长暗网市场的加密货币进行直接监管。例如，2019 年 6 月，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发布了一份指南，敦促为客户办理加密货币转账

的公司要识别转出方和转入方。这份指南主要遵循 2018 年 G20 峰会提出的建议。在 G20 峰会上，与会领导人要求国际监管机构在政策层面对加密资产采取应对措施，尤其是与了解客户、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有关的政策。由兑换、电子钱包和其他加密支付助推因素组成的初创生态系统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来落实类似金融行业的标准，但监管机构需要着手为强化审查做一些准备。脸书即将上线的加密货币 Libra 只会使这项工作变得更加紧迫，毕竟对 20 多亿的脸书用户而言，使用虚拟资产的门槛将进一步降低。

界限分明

独裁政权将继续屏蔽暗网，并防止暗网因支持异见人士和活跃分子而对合法性产生威胁。面对这种威胁，自由公民社会的自然反应将是主张 Tor 不受监管和管制，以保护言论自由与个人隐私。但暗网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这要求监管部门和执法机关采取全新的方法，以挫败那些在自由社会中被视为非法和不道德的活动，同时保护匿名网络的真正利益。FD

阿迪蒂·库马尔（ADITI KUMAR）是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执行主任。埃里克·罗森巴克（ERIC ROSENBAACH）是贝尔福中心的联合主任，前美国国际安全事务国防助理秘书。



腐败的代价

贪污造成税收损失，而且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保罗·莫罗、保罗·梅达斯、让-马克·福尼尔

2013年，在对洗钱案件进行例行调查时，巴西的调查人员碰到了一个大难题：贿赂和操纵投标案牵扯到国有石油巨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这项逐渐为公众所知的“洗车行动”经调查发现，在过去几年间，巴西部分大型建筑工程公司为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获得利润丰厚的合同，向其行贿，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这一丑闻牵涉了数十名政府官员和政客。

当然，这种幕后交易不仅出现在巴西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一个轰动的案件，日本多名政客收受贿赂，批准美国军用飞机采购合同。这个丑闻成为通过立法手段来禁止美国企业在海外行贿的一个诱因。但无论此类丑闻在何处发生，腐败，或者说以权谋私，都会使国家的各种活动扭曲变味，并最终牺牲经济增长和民众的生活质量为代价。

就其影响面而言，腐败可对公共财政产生极大的危害，因为政府的税收收入减少，但在商品和服务或者投资项目方面却需要投入更多。然而，腐败的代价远不止收入减少这么简单：政府的重点支出发生扭曲，这削弱了国家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能力，同时也减少了投向教育、医疗和有效基础设施的公共资源——这些投资会提高经济效益和全民的生活水平。

公信力受损

腐败如何限制收入？一方面，腐败会损害政府公平、高效地征收税费的能力。腐败的立法者在受贿后，可能会推出免税和其他存在税收漏洞的法规，从而有可能减少税收收入。税收制度越是复杂和不透明，这种制度就越容易为官员利用，在管理中擅自决策，为了一己之私索取贿赂或回扣。例如，1996年《纽约时报》报道的一个案件中，市政工作人员涉嫌收受贿赂，制造出逃税者已纳税的假象。更广泛地讲，税法的歪曲和税收官员的贪腐会降低公众对国家的信任，影响公民缴税的意愿。

遏制腐败可产生重大的财政利益。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被认为腐败问题较少的国家，财政收入更高；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同，但腐败问题最严重的政府相比，腐败问题最少的政府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要高出4%。过去20年间，有些国家在反腐斗争中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如果所有的国家都采取类似的举措减少腐败，那么它们的税收收入将增加1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25%。

热点领域

虽然腐败几乎无处不在，但其在几个热点领域中是最为普遍的。其中一个热点领域是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采矿。自然资源开采过程中的暴利成为行贿，甚至是政府俘获的主要诱因。在政府俘获中，公共政策和法规会受到那些企图控制国家资源的腐败活动的影响。的确，资源丰富国家的

腐败问题往往更为严重，因为在使用自然财富时，这些国家的机构较为羸弱，且问责制度糟糕。

腐败也是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这类企业中，管理工作很容易受到公务员和当选官员的影响。因此，在腐败问题较严重的国家，能源、公用事业和交通等重要行业的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运作效率更低。几个涉及这类企业的知名腐败调查案印证了滥用公共资源带来的风险，其中包括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法国的埃尔夫-阿奎坦（私有化之前）以及南非国家电力和国家运输公司。而且，研究表明，腐败是私营公司比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更高的原因之一。显然，在那些腐败问题不太严重的国家，所有制类型与企业业绩差异的关系就会小得多（Baum and others, 即将发布）。

自然资源开采过程中的暴利成为行贿，甚至是政府俘获的主要诱因。

政府的商品和服务采购工作是另一个热点领域，因为这种采购涉及大量资金。在由36个发达经济体组成的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公共采购平均占GDP的13%。与公共投资有关的采购是腐败重灾区，因为大型项目往往有其独特之处，这使成本比较更为困难，也使贿赂更易被掩盖、成本更易被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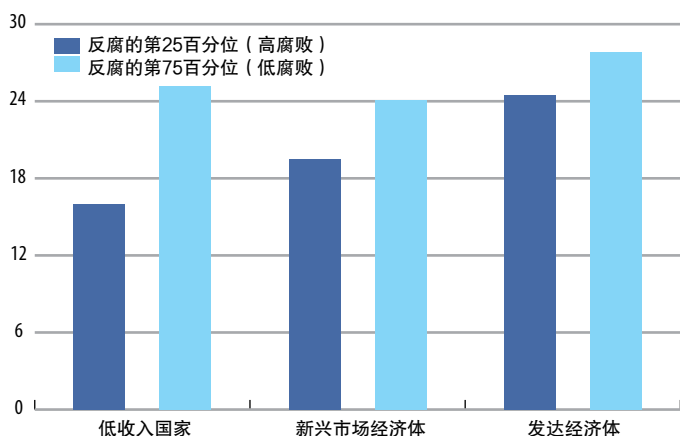
正因为这一点，腐败往往涉及那些投资大的复杂项目（例如，建筑和国防设备）。相比之下，在老师和医务工作者的工资上收取贿赂要难得多。因此，在腐败高发国，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可能较低，从而使工人的工作效率以及生活水平更难得到提高。在低收入国家中，用于教育和医疗的专项预算要比腐败问题更严重的国家低1/3（见图，下一页）。

在腐败问题更普遍的国家，学生的考试分数往往也更低，这不足为奇。虽然这些国家的学生在教室里学习的时间与其他国家的学生没有差别，但教学质量更差。这不仅仅是教育支出少的原因。在某些国家，获得公立学校的教职经常会受到贿赂或



倾斜的重点

在腐败高发国，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较低。
(占总支出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政府财政统计》；IMF员工的估算。
注：截至2016年的数据。

关系的影响。在几个发展中国家中，教师旷工这种不太严重的腐败现象十分普遍。巴西的一项研究发现，由于腐败问题，联邦政府向地方政府转移的教育资金会有部分流失，而且学生的退学率较高，考试分数也更差。

格鲁吉亚的成功之路

减少腐败并非易事，但能带来不少好处。那些大幅度减少腐败的国家可获得回报：税收收入激增。格鲁吉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3年，格鲁吉亚新政府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以解决严重的腐败问题。结果，在五年间，即便在税率降低的情况下，该国的税收收入从占GDP的12%攀升至25%。

格鲁吉亚的成功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税收遵从文化：认为应该杜绝逃税的民众所占比例从50%跃升至约80%。随着服务的完善，包括犯罪率下降、停电次数减少、对政府重拾信心，促使民众缴税

意愿增强。同时，随着税收收入的增加，政府也有可能解决工资和养老金拖欠的问题，进一步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最有效的反腐方式是什么？重大的政治变革偶尔会带来改革和快速发展的机会。格鲁吉亚的情况正是如此。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进步可能是循序渐进的。成功离不开政治意愿、毅力和多年坚持完善制度的决心。为了更好地了解对倡导廉洁和问责发挥重大作用的制度特征，我们对很多国家进行了研究。我们的分析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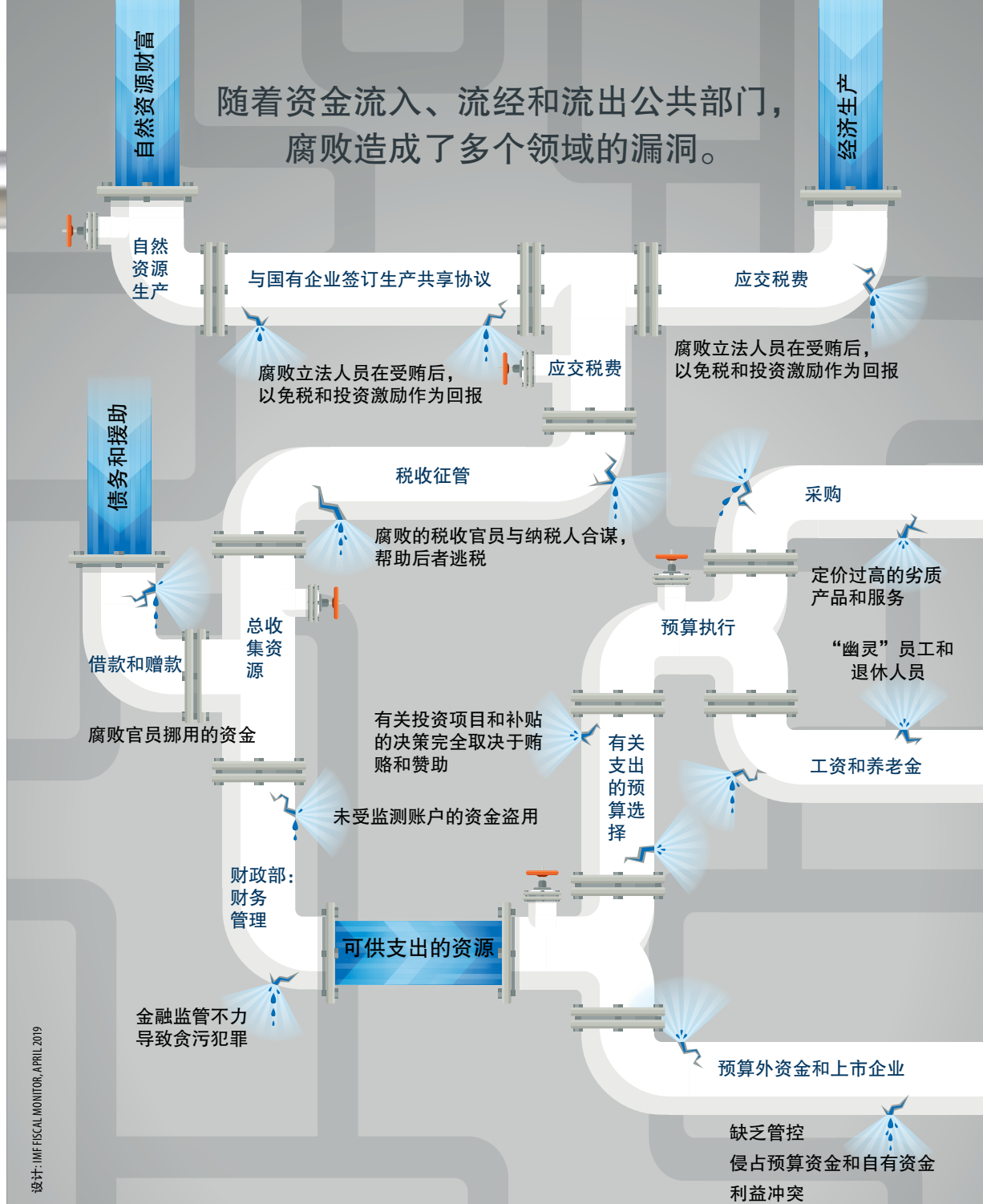
- 当各国完善几个相互支持的制度来解决腐败问题时，成功的几率就会提高。它们应首先关注风险较高的领域——例如，采购、税收征管以及自然资源管理——以及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财政治理框架离不开一个重要支柱，即有道德修养的专业行政部门。机构、部委和上市企业的负责人必须从高层入手，定下明确的基调，倡导有道德的行为。

- 政府需紧跟不断发展的科技并抓住机会纠正错误行为。我们的分析发现，当政府在信息与通信技术方面投入资金，且不断增加透明度时，索贿的几率就会下降。例如，在智利和韩国，电子采购系统已成为提高透明度和杜绝腐败的强大工具。

- 提高透明度、促进出版自由有利于加强问责制。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巴拉圭正在借助在线平台，让民众监督投资项目的物资和资金进展。我们的跨国分析表明，在反腐过程中，出版自由能进一步实现财政透明的好处。仅发布数据是不够的，还要确保数据得到广泛传播和充分说明。在巴西，对于那些被怀疑滥用公款的官员来说，审计结果的公布会影响他们的仕途，尤其是在有广播站的地区。

除了努力强化国内体制之外，国际合作也至为关键。全球有40多个国家都规定本国企业为了拓展海外业务而行贿是违法行为。各国也可以大力

随着资金流入、流经和流出公共部门，
腐败造成了多个领域的漏洞。



打击洗钱，减少跨国犯罪机会，以防罪犯将腐败所得藏在透明的金融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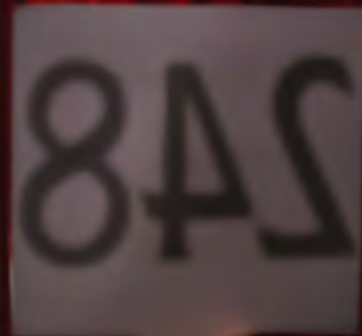
反腐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但它是恢复民众对政府信心的必要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腐也会带来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反腐应从国内政治意愿入手，不断加强制度建设，推动廉洁和问责制，加强国际合作。FD

部副主任，保罗·梅达斯（PAULO MEDAS）是该部副处长，让-马克·福尼尔（JEAN-MARC FOURNIER）是该部的经济学家。本文基于IMF的《财政监测报告》（2019年4月）第二章“遏制腐败”。

参考文献：

Baum, A., C. Hackney, P. Medas, and M. Sy. Forthcoming, "Governance and SOEs: How Costly Is Corruption?" IMF Working Pape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保罗·莫罗（PAOLO MAURO）是IMF财政事务



艺术品 背后的洗钱犯罪

监管不力的艺术品市场充斥着洗钱犯罪的机会

汤姆·麦施博格

马修·格林 (Matthew Green) 在令人陶醉的艺术氛围中长大。从童年开始，围绕在他身边的就是绘画大师和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他的父亲理查德 (Richard) 在伦敦拥有两个知名的画廊。画廊经营着毕加索、康斯太勃尔、夏加尔和布鲁盖尔这些传奇大师的作品。51 岁的马修·格林正准备接管家族生意，以便父亲能腾出精力去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可在 2017 年底时，美国检察官声称格林与一家毛里求斯投资公司，博福特证券 (Beaufort Securities) 的老板有牵连。这个公司涉嫌诈骗、操作股票和洗钱等犯罪。对于该公司的几位老板来说，欺骗投资者购买毫无价值的股票倒也不是难事，难的是将非法所得合法化。Beaufort 公司过去把钱存在离岸银行的虚假账户里，然后一点点地把钱转移到全球金融体系中。该公司还购置并快速卖出房产，甚至不惜亏本，以此把非法所得转化成可计为房产交易所得的资产，而且屡试不爽。

如今，像 Beaufort 这样的洗钱公司正在寻找更隐秘的洗钱方法。而马修·格林知道如何进行数百万美元艺术品的交易。2017 年底，Beaufort 公司的同谋找到格林，其中一位是在该公司卧底的美国联邦警察。格林当时称，他可以将毕加索 1965 年的画作《Personnages》以 670 万英镑 (当时约合 900 万美元) 出售，尽管他知道对方的钱是证券欺诈所得。格林伪造了所有权文件，声称这部画作已经售出，可实际上一直把毕加索的这幅作品存放在某个地方。他将来会假装从同伙那里以更低的价格回购这幅画，并获得非法转移现金的 5%—10%。

工人们在搬动让·米切尔·巴斯奎特 1982 年的画作《红骷髅》。



照片: GETTYIMAGES / JACK TAYLOR / STRINGER

艺术品市场是洗钱犯罪的理想之地。

彼得·B. 哈代 (Peter B. Hardy) 说：“对洗钱犯罪而言，艺术是一种极有吸引力的工具。”他曾是美国检察官，目前为各类企业和行业提供反洗钱法规合规方面的咨询。“艺术品会被藏起来或走私出境，这类交易往往私下进行，价格受到操纵，主观且极其高昂。”

美国和欧洲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案件促使各国加大力度打击非法的艺术品和古董交易。合法的艺术品市场本身规模巨大。2018 年底，该市场的全球市值估计达 674 亿美元。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调查，地下艺术品市场涉及盗窃、假冒、非法进口和有组织盗取等犯罪活动，每年产生的非

法收入高达 60 亿美元。其中，洗钱和其他形式的金融犯罪产生的非法收入最高可达 30 亿美元。

对格林来说，卷入这场洗钱风波到头来也只是两手空空。在美国，他因六次洗钱未遂面临起诉。他在伦敦梅费尔区的画廊已经被英国监管机构宣布破产。尽管格林并未被认定为逃犯，但法庭的记录表明，美国检察官已经向英国、匈牙利、圣文森特、格林纳达和毛里求斯的执法机构披露了他的起诉书和逮捕证。此外，还责令他交出那幅毕加索的画作。格林和其他被控参与毕加索画作非法交易的嫌疑人使用的犯罪手段并不难效仿，至少现在是这样。格林当时利用的就是监管漏洞，如今美国和欧洲的立法机构正在努力填补这个漏洞。不同于银行，人寿保险公司、赌场、货币兑换商，甚至于贵金属交易商、拍卖行以及艺术品卖家没有义务向政府主管部门报告它们的大额现金交易。在实际

生活中，交易商有权为买卖双方保密。而且与从事大额资金交易的美国企业不同，这些交易商在怀疑所收资金的来源时，不必向美国财政部汇报所谓的可疑活动。

议会审议的法案

根据国会正在审议的《防止艺术品及古董非法贩卖法案》，美国政府将要求“艺术品和古董交易商”制定反洗钱计划、记录现金买卖并向联邦监管机构报告超过1万美元的可疑活动和交易。此外，要求艺术品行业调查客户的背景，分析买卖活动，以便找出洗钱活动的蛛丝马迹。

在欧盟，根据《第五次反洗钱指令》规定，艺术品企业必须加大力度，认真审查客户情况，“尽可能合理地”发现所有金额大、异常复杂或者隐秘的交易的目的是。

在很多艺术品交易商看来，美国和欧盟的司法变化将使商家失去一个重要的卖点——不公开客户的身份，保持艺术品市场的不透明性。过去几年间，当艺术品市场成为人们眼中更斯文体面的追求时，政府主管机构并不真的愿意像对待银行或经纪行业那样，对艺术品市场进行非常严厉的监管。过去十多年间，由于大量资金流入艺术品收藏市场，并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要阻止将盗取和走私的文物从战火纷飞的国家秘密贩运到其他国家，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如今，法官官员，甚至一些艺术品商人都表示，由于越来越多的洗钱犯罪分子发现艺术品市场是完成洗钱的好地方，过度保密已成为一个弊端。正如联邦调查局(FBI)和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指出的那样，“与其他贸易行业相比，艺术品市场出现可疑金融活动的风险会更高”，这是因为“与全球其他市场相比，涉嫌违法的艺术品交易的规模十分庞大”。

针对马修·格林及其同伙的起诉书甚至包含了卧底警察用磁带录下的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据说格林洋洋自得地夸口说，“艺术品交易是唯一

不受监管的市场”，客户“甚至可以用假名字来购买艺术品，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起诉书引述了格林的话。

“毫无疑问，如果将艺术品和古董交易商纳入需依法汇报可疑资金流入的企业名单中，执法部门将会破获更多与艺术品和洗钱有关的案件。”前美国检察官和艺术品及古董法专家里克·圣希来尔(Rick St. Hilaire)说道，“如今，这个名单已完全开放。”

那些主张加大监管力度的人指出，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是，艺术品、文化资产以及古代文物能像银行和其他行业一样，也受到同样严厉的金融监管。

巴塞尔治理研究所理事托马斯·克里斯(Thomas Christ)说：“艺术品市场是洗钱犯罪的理想之地。”这个研究所是瑞士的一家非营利机构，主要负责制定针对艺术品交易商的反洗钱标准。他补充道，“我们必须要求较高的透明度，资金的来源和去向都必须明确。”

行业的反对之声

意料之中的是，艺术品行业正在抵制这些法规。有些部门坚持称，通过艺术品交易进行洗钱犯罪的情况实属少见，或者这是被那些总想制造轰动性新闻的执法部门夸大了。艺术品和古董经销商协会国际联合会等组织则声称，对于艺术品市场中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有关汇报情况的要求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詹姆斯·麦克安德(James McAndrew) 曾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特工，如今代表交易商和收藏家进行游说。在去年一场有关洗钱工作的会议上，他说：“有关拍卖是不道德的或是邪恶的，这种想法太离谱了，纯属无稽之谈。”作为支持硬币交易商和金条产业的全球遗产联盟的主席，彼得·托姆帕(Peter Tompa)警告道，由于新标准的代价太大，难以推行，因此该行业的很多商家将退出市场。

代表着美国大型和小型艺术品交易商和买家

但支持者表示，即便是二流艺术家的艺术品的估价都极其高昂，这让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对这个脆弱的行业加以限制。

利益的文化政策委员会指出，“利用艺术品（尤其是古董和文物）进行洗钱并不现实，毕竟艺术品短时间内难以出手，买家通常是收藏者”，并不是为了使可疑资金“合法化”而想在短时间内成交的罪犯。

但支持者表示，即便是二流艺术家的艺术品的估价都极其高昂；在这个毒枭、石油寡头和腐败官员都急切地将赃款变成干净或可替代资产的时代，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对这个脆弱的行业进行限制。如今，他们不得不上这个势头，而且洗钱诉讼案层出不穷，让人们觉得这种顾虑不无道理。

例如，美国2014年的罗纳德·贝尔西阿诺贩毒案不仅涉及大麻贩卖，还涉及利用艺术品洗钱的阴谋。警方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处仓库查获了400多万美元现金，没收了大约125磅大麻和价值超过619000美元的油画。检察官指出，毒品交易商接受艺术品，而不是现金。他们得到承诺，一旦艺术品交易商把这些交易隐藏在账本里，他们就可将艺术品再卖给交易商，从而达到洗钱的目的。2015年，贝尔西阿诺被判处五年监禁。

在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件中，巴西的一位金融家被控挪用银行的数百万资金，企图通过购买昂贵的艺术品（包括让·米切尔·巴斯奎特1981年的画作《汉尼拔》）来洗钱。纽约联邦法官指出，金融家艾德玛·西德·费雷拉（Edemar Cid Ferreira）企图将巴斯奎特的这幅画作，以及其他大约90件价值不菲的艺术品走私到美国境内，而且报关时声称每件的价值仅为100美元。2006年，他被定罪并判处21年徒刑。尽管如此，由于美国漫长的上诉过程和复杂的司法制度，这些艺术品直到

2017年才回到巴西。

小型诈骗犯罪每天都在上演。例如，印度官员说，从偏远的寺庙和坟墓中盗取的文物都被当作货币兑换的工具。这些文物被运到中国香港或曼谷，可在报关清单上申报说是仅值几卢比的赝品。收藏家和交易商随时准备花上几千美元去购买这些文物。这些文物会附带一些伪造的文件，证明它们是通过合法途径购买的。交易商会留下一部分收入，然后将余下的钱通过不受监管的非银行金融公司汇给犯罪团伙。

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文物联盟是一个致力于打击文物贩运等犯罪活动的组织。文物联盟的主席黛博拉·莱尔（Deborah Lehr）警告说，恐怖组织已经在利用艺术品和古董产业来筹集资金。他们在古代文化遗址大肆掠夺，然后利用中间人来出售盗取的商品。她说：“当务之急就是确保非法文物无法进入美国市场，同时提倡负责任的交易行为。”

前检察官哈代表示，由于高达70%—90%的珍贵文物拍卖目录很少提供有关买方的信息，艺术品商人的明智做法是直面现实，努力提高透明度并加强尽职调查。他说，那些计划出台的法规将对艺术交易商应首先采取的措施进行法律保护，以免发生犯罪活动。

他说：“有时，资金的来源比艺术品的来源更重要。”^{FD}

汤姆·麦施博格（TOM MASHBERG）是一名资深记者，为《纽约时报》和其他刊物撰写艺术品和文物犯罪的文章。



弊大于利

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可以从减少腐败中获得更大的益处

尼尔森·索布里尼奥、维姆·塔库恩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新一任国家领导人再次表达了他们惩治腐败的决心。这个趋势体现了大家的共识：有效的治理是促进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在这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大陆上，增长与治理之间的关系尤其密切。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非洲通过减少腐败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我们的研究表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的治理红利是世界其他地区（甚至是那些同样被认为治

理能力薄弱的地区）平均水平的两到三倍。如果能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治理能力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该地区每年的人均 GDP 预计会提高一到两个百分点。

当然，低腐败和有效治理并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一些被认为治理薄弱的国家经历了由丰富的自然资源等其他因素推动的经济的强劲增长。在其他情况下，那些治理良好的国家未必会

实现经济的强劲增长。但我们发现，腐败往往会削弱经济增长，在经济引擎中更像是沙子，而不是石油。

世界各国的治理情况千差万别，其中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表现都不佳。撒哈拉以南非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国际国家风险指南》2017年治理指数，该地区的30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的得分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见图）。

有些非洲国家已经在惩治腐败和加强治理方面表现出坚定的决心。例如，在所谓的“国家俘获”这段插曲中，南非政府机构及各个下属部门都对“精英集团”俯首帖耳。自2018年开始，政府一直在开展大胆的反腐斗争，以期通过完善采购、打击走私和重建关键机构（例如，税收部门和反腐机构）的能力，扭转腐败造成的危害。

同样，安哥拉失去了其对数十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的控制权。这笔巨款被一位无赖的基金经理及其几名同伙挪用了。他们通过离岸金融中心，完成了复杂的金融交易，然后将黑钱投向个人控制

的企业。2017年当选的安哥拉新政府更换了管理层，对以前的管理层展开调查。这笔基金已经收回，目前被再次投向能造福安哥拉民众的项目之中。

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在分配缺乏竞争力的油气合同以及征用私有资产的过程中，像回扣这样的做法仍然存在，不仅侵犯了财产权，违反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而且对投资和增长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各国央行的独立性会受到冲击。有些政治家想通过货币宽松政策，而不是改革，来寻找解决预算不足或者增长乏力的权宜之计。

由于腐败的受益者经常会进行反扑，因此完善治理绝非易事。这是各相关方（包括政府、机构、公民社会、媒体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一场复杂而长期的斗争。因此，要想取得最终的胜利，绝对离不开坚定的政治决心。

传统政策

从经济角度来看，有些基本原则适用于大部分国家，能促进治理，例如强化法律的实施、提高政府效率、支持财政和反腐机构。

博茨瓦纳、智利、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等国家一直在努力减少腐败。它们在反腐斗争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政治意愿、减少腐败机会的措施（如减少官僚作风、降低贸易壁垒），制约腐败行为的措施（如独立的司法制度或强大的反洗钱框架）以及完善财政部门（通过提高透明度和加大管控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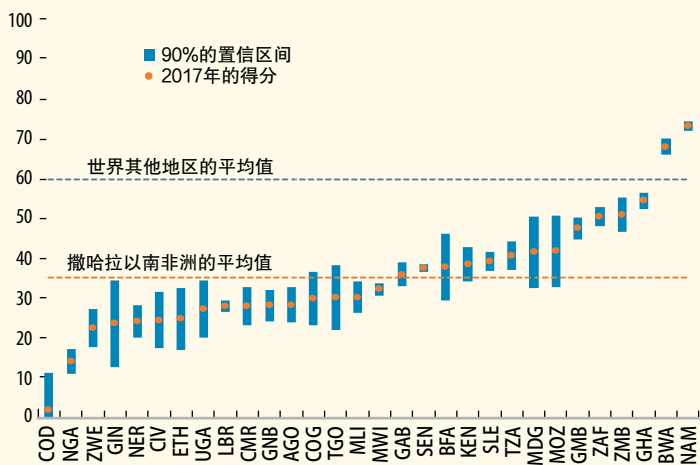
在那些肩负反腐使命的机构中，积累专业知识和赋予员工权力会增强他们的起诉能力，弥合民意与法庭之间的差距。当政府法治能力不足时，反腐案件往往会失败。加强公司治理并完善权力制衡制度，尤其是通过为国有企业建立更有效的治理结构，也是有效的方法。

体制改革需要一定的时间，加大现有法规的执行力度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低于平均水平

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治理得分都低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除了表现一直很好的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

（百分比）



资料来源：《国际国家风险指南》。

注：图中的数据标签使用的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国家代码。



通过为政府提供全新的平台，吸引公民和企业家参与其中，数字化开辟了全新的反腐之路。此外，数字化降低了信息获取的门槛，从而提高了透明度和问责力度。很多非洲国家正借此机会，以各种方式来提高服务交付和治理能力。

例如，在税收领域，电子纳税申报、退税和报关可节省时间并降低成本，也减少了腐败的机会。数据分析使基于风险的审计成为可能，从而缩短了报税的时间。

数字化还能提高支出效率。生物识别技术和电子支付系统有利于减少官僚作风引起的低效工作、更好地满足目标群体的需要、增加财政资金，并且可获得更多的好处。例如，人们通过数字支付来交学费，为的是绕过官员，减少欺诈和腐败。

数字化还有助于提高采购的透明度、包容性和效率。集中采购可减少国有企业以及省和地方政府中的利益冲突和滥用职权的现象。

实际效益

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众来说，这种治理红利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加强治理和减少腐败将给政府带来更多的收入，提高收入的利用效率，加大私营投资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有更多的资金可投向那些对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的服务，例如健康和教育。我们预期它会在多个不同方面产生积极的效果：

- 完善税收合规，加强税收征管。在税收官员严格执行治理原则的情况下，海关和税收部门能更有效地打击走私和非法资金流等犯罪。如果民众相信政府支出的有效性，那么他们可能就更愿意依法纳税。

- 更有效的预算流程，更高效的政府支出。有效的治理可帮助政府降低投向可能造成贪污的项目的风险（例如，华而不实的東西）。

- 巩固发展成果，促进社会融合。随着收入

衡量治理效果的方法

治理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和制度的多层面的问题。那些会产生重大经济影响的指标包括腐败（以权谋私）、政府效能（公共政策和服务的质量）、监管质量（政府制定和实施营商政策和法规的能力）和依法治国（尊重合同履行、财产权和执法）。

要将各种不同的治理要素整合到一个指标中，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由于文化差异——一个国家的腐败在另一个国家可能是惯例，或者治理的不同特征会聚合在一个指标内，那些综合性的主观测量方法可能无法充分地体现现实情况。虽然对腐败的认识往往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可大多数测量方法不够具体，无法有效地说明政治机构、政府法规和政策的质量。

的增加，政府可在民生方面投入更多资金。加强治理有可能使穷人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毕竟他们更依赖于社会服务。随着政府加大对教育和医疗领域的投资，这将推动经济和社会包容性，降低脆弱性。

非洲大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正处于转折点。通过数字化和开放式数据，年轻一代可获取实时信息。目前，他们要求那些当选的官员能确保透明度和问责制。而且，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并融入全球经济，非洲各国需要坚持有效的治理原则。尽管各国选择加强治理的途径不同，但最终获得的红利将非常丰厚，完全值得争取。有效的治理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FD}

尼尔森·索布里尼奥（NELSON SOBRINHO）和维姆·塔库恩（VIMAL THAKOOR）都是IMF非洲部的经济学家。本文基于IMF工作报告（19/1），作者包括：阿米尼·哈马迪（Amine Hammadi）、马歇尔·米尔斯（Marshall Mills）和理查多·维罗斯（Ricardo Velloso）。



新闻调查与 揭秘

腐败曝光，调查记者功不可没

安德烈亚斯·阿德里亚诺

1971年，揭秘者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发现了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他耗费大量的时间复印了7000多页资料，并将其透露给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四十年后，德国记者巴先·欧伯马尔（Bastian Obermayer）收到一个匿名人士寄来的U盘，其中存有巴拿马一家律所的1100万份文件。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富人和权贵的不正当交易及避税计划。由于文件数量巨大，即便欧伯马尔用上全编辑部的设备也无法处理，于是他向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求助，来自90个国家

的250名记者伸出了援手。

这些资料，即《巴拿马文件》，于2016年4月被公诸于众，将全球经济背后那些涉及面广、复杂而隐秘的交易悉数曝光。这一丑闻导致不少总理、首相和高级官员相继落马，从爱尔兰到蒙古，涉事国家不胜枚举。

从《五角大楼文件》到《巴拿马文件》，以及其间曝光的其他重要内容，调查性报道对揭露机密和丑闻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并非一条坦途：尽管当前可调查的领域日益增多，但愿意公布调查结果的机构却不断减少。全球对传统媒体的扼杀有案可查。一项研究显示，2004年，仅美国就有1800种地方报纸停版。互联网等技术虽然提供了新的平台，但同时也带来了问题。与之前的内幕人士良心发现而揭发机密不同，现今的许多揭秘都是黑客入侵的结果，这引发了伦理和法律问题。

查尔斯·路易斯（Charles Lewis），常被人称为“查客”·路易斯（Chuck Lewis），在其职业生涯中亲眼目睹了调查性报道的兴衰。水门事件丑闻期间，路易斯是一名参议院实习生，后来又与传奇人物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共事，最后，他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资深调查性新闻制片人。1989年，路易斯辞职创办公共诚信中心。多年后，他又创办了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当前活跃在美国的200多家非盈利新闻组织中，有一部分是在路易斯的帮助下创建的。路易斯目前担任华盛顿美利坚大学新闻学教授兼调查报道工作坊执行总监。《金融与发展》的记者安德烈亚斯·阿德里亚诺有幸对其进行了采访。在采访中，他与阿德里亚诺分享了自己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比如对金融问题的调查、新闻机构发展前景惨淡的问题，以及作为新型揭秘者的黑客所引发的伦理问题等。

地方报纸几乎已经全部停版。这对地方层面的新闻调查会产生何种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我开始进入职场，最初是在位于特拉华州的《威明顿新闻报》编辑部的体育部工作。《威明顿新闻报》是中小型报刊中的佼佼者。但是，他们经营不善，员工人数从过去的187名减少到目前的35名。就当前而言，新闻记者人数与1972年没有变化，而联邦预算已增长了近两倍。在美国，赋闲的记者人数高达数万名。美国的多数法律都是由州政府制定的，但是州首府的记者人数却不到三分之一。在华盛顿，没人会报道27个州的国会议员的情况。此外，在美国

还有一种我称之为“新闻荒漠”的现象，没有媒体每天专门播报地方新闻，无论是电台还是地方或州报纸，而且这种现象十分普遍。

有可能知道未报道的新闻吗？

不可能的。华盛顿有超过 100 家联邦新闻社。《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精英媒体不会报道所有新闻。有时，你可能会从不知名的简讯中获得想知道的新闻。简讯的数量成千上万，覆盖各行各业的新闻，而且它们可能仅代表个人的兴趣。

这对金融与经济新闻报道会产生哪些具体影响？

实话实说，我担忧的是，能获得实质信息的人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他们会订阅主流媒体的新闻，并从头到尾仔细阅读。当然，他们这么做的部分目的是为了赚钱。然而，其他民众，包括受过教育的人，并没有付出同等的时间和精力阅读或消化新闻。对于有实质信息的资料，阅读与不阅读不可同日而语。

非营利新闻组织的建立是为了弥补记者的失业情况吗？

美国目前有 205 家非营利调查性新闻组织和 27 家国际组织。近年来，慈善机构和慈善家纷纷崛起，他们捐赠了 10 多亿美元来报道某些地区的地方报纸不能再报道的地方新闻。这种做法不是为了弥补新闻机构的缺失和记者失业的情况，而这些情况本来更为糟。据我估计，这些非营利组织目前拥有的记者人数高达 3000 人。

2008 年左右，由于申请人数下滑，普利策奖开始同意非营利组织提交申请。我创办的两家组织——公共诚信中心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都荣获过普利策奖，而 ProPublica 等非营利组织获奖的次数目前已高达十几次。

目前有很多调查性报道都是基于黑客入侵这种违法行为展开的，而不是由揭秘者良心发现而揭发的，比如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揭秘的《五角大楼文件》。这种现象是否让您感到困扰？

首先，就《巴拿马文件》而言，没人知道谁是真

正的揭秘者，可能是黑客，亦或是知晓内幕的人士，比如对当事方不满的员工，或认识内部人士的人。对于此事，不久就会有新书出版或电影播出，届时，我们可能会获得更多信息。

从广义而言，这其中存在着灰色地带。前段时间，在欧洲的一次调查性报道大会上，组织者有意将我和《纽约客》杂志的调查记者西莫·赫希（Seymour Hersh）以及其他一些知名记者和黑客安排在同一张桌子享用晚宴。能和他们交流真是幸事。其中有些黑客的入侵目标十分明确，因为他们认为社会出了问题，或者认为某公司有保护伞，这就像一位政府雇员因为看到某些内容之后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所以就开始泄密。

我知道有些黑客是为了钱而做违法之事的。同样地，其中也存在着灰色地带。如果的确存在权力滥用，且只有通过泄露的方式才能让公众知情，那么揭秘不是件好事吗？《五角大楼文件》公布后，马上就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等待五角大楼采取行动，那他们仍将秘而不宣。

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存在权力滥用。我必须首先承认的是，我是一名调查性记者，而且我认为公众有知情权。但是，具体事情要具体分析。有时候，人们的确是出于自己的良心在做事，而且他们的揭秘对整个社会而言可能是有益的。

如果您有机会建议政府提高透明度，您会说什么？

我认为，每个民主政府或略有责任感的政府都应密切关注离岸司法管辖问题。如果美国特许的银行在美国的 60—90 个离岸司法管辖区从事未经法律允许的业务，或可能甚至直接进行违法交易，那么美国政府、国会及国家税务局就应为此感到焦虑。可现实却恰恰相反，每个人似乎都对此不甚关心。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此，上述所有机构都需加大相关讨论和报道，加深理解，并增强责任感。FD

安德烈亚斯·阿德里亚诺（ANDREAS ADRIANO）是IMF信息交流部的高级官员。

由于篇幅所限且为了表达得更清晰，本文对采访稿进行了编辑。

肩负使命的 经济学家

康铨承近期有幸采访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蒂夫·米安。米安教授认为，从道德角度来看，弥合贫富差距势在必行

每个人身边都会有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有人嘲弄说，这就是千禧一代的特点：美式酪梨吐司和价格不菲的拿铁会搞得他们入不敷出，经常要靠借钱度日。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公共政策和金融教授阿蒂夫·米安 (Atif Mian) 认为，在现代，一个人靠信用贷款过日子不能算是挥霍。相反，他认为，过度借贷恰恰是经济体系因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扭曲的证据。

米安说：“这似乎表明，现代经济对信用的依赖已经过度。我们要搞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

这位 44 岁的巴基斯坦裔美国人设法从新的角度来说明我们现代人为什么会对债务过度依赖。在这个过程中，他撰写了一篇新的论文，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大的一次经济衰退。在他和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阿米尔·苏菲 (Amir Sufi) 于 2014 年合著的《房贷》(House of Debt) 一书中，他们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大衰退”。正是凭借这本书，米安于当年入选 IMF 发布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25 位年轻经济学家。

两位作者分析了海量数据，并从中发现偿债能力最差的借款者的家庭债务大幅增加，这加剧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这本书中，他们认为决策者犯了错误，将过多的精力放在银行系统和救助银行上，而不是借款者身上。

苏菲说，他们的研究有助于 IMF、美联储、英格兰银行以及澳大利亚、中国和以色列的央行更加重视家庭债务问题。

自本书出版后的五年间，米安和苏菲扩大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将着眼点放在家庭债务和经济不平等上。在近期的研究当中，他们把 1980 年以来不断恶化的家庭债务与超级富豪的崛起联系起来，认为日益严重的收入差距与巨额财富的集聚息息相关。巨额的财富使经济系统充斥着宽松的信贷，而这种信贷只刺激了消费，无法通过实际投资来助力经济增长。

热衷效率

在很多次电视台采访中，相比起谈吐不凡、语

速很快的搭档，安静而内敛的米安似乎显得有些相形见绌。但是离开了摄像头，在私下交流中，米安温和的性格反而令人觉得友善体贴、魅力十足。他对这门沉闷的学科充满热情，但这种热情却往往被人忽视，而让他醉心于这门学科的原因是能够借助其中的知识提高效率。

“我热衷于经济学的原因是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组织起来，发挥人多力量大的效应，这也是我对经济学的定义。”米安说道，“我认为，经济学是一个独特的领域，它的研究重点都是类似问题。”

跟米安一起生活了近 20 年的妻子艾莎 (Ayesha) 打趣说，他在个人生活中也讲究效率。他们经常在晚上招待宾客，在这种时候，他对效率的执着则体现在他十分热衷于“高效地利用屋内空间”。

她笑着说：“如果有一个三座沙发，他希望沙发上能坐三个人。可如果这时只有两个人安逸地坐在沙发上，他就会觉得这样很低效。诸如此类的小事，他从来不会忘记。”

可如果没有第三个人去坐那个沙发呢？“那么他的脸上就会露出难过的表情。”

米安接触到经济学纯属偶然。他出生在巴基斯坦的一个中上阶层的家庭，是家里的独子，他的父母都是政府医生。他说，父母本来希望他能当医生或工程师。由于他对医学毫无兴趣，他选择了工科。他的家庭非常重视教育，母亲为了他的教育搬到了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尔，而他的父亲仍在几百英里之外的地方工作和生活。

17 岁那年，在父亲的鼓励下，年轻的米安申请了几所美国大学，最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 (MIT) 电气工程专业的全额奖学金。他说，收到 MIT 录取通知书是“他一生中最快乐 (和最幸运) 的事情之一。”

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是米安人生中第一次探索巴基斯坦以外的经历，也是他第一次独立生活。尽管他是个勤奋的孩子，但他并不喜欢工科。米安转而攻读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在修完人文学科的学分时，他意外接触到了经济学。

他发现，经济学的的一个研究领域可以解决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即自他的童年以来，巴基斯

坦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巴基斯坦是一个独裁国家，因为暴力、极端主义和国内宗派间的紧张关系而四分五裂。

米安说：“你可能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比如，难道世界真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吗？暴力不断、社会分裂？难道不能变得更好吗？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希望能改善的方面。”

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获得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学士学位，并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了一小段时间。之后，他决定回到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2001年，他取得了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银行和治理。接着，他去了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担任金融学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直到2009年。之后，他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经济学、金融和国际商务教授。2012年，他加入普林斯顿大学。

研究伙伴

苏菲是巴基斯坦裔美国人，出生在底特律，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长大。苏菲与米安是经两人共同的朋友介绍后相识的。这个朋友认为，他们有着相似的兴趣。据苏菲讲，这种兴趣是“利用应用微观经济学知识，回答金融和宏观经济学交叉领域的重要问题”。

在这两位作者看来，使用微观数据或颗粒化数据来回答宏观经济问题是他们对经济学的特殊贡献。米安说：“自从我们早期对2008年的经济衰退进行研究以来，这种经验主义方法才真正受到重视。”

他们的那部著作《房债》正是源于共同的兴趣。这本书入围了《金融时报》2014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尽管最终获奖是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

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认为，这部著作“可能是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大衰退之后最重要的一本书。”在一篇书评中，萨默斯表示自己赞同作者的主张：在大衰退期间，我们本应该更加重视家庭。

在与米安交谈时，我几乎能感到他的工作是建立在一个理念之上，即对社区或国家的福祉取

决于全体民众是否富庶的坚定信念。他说：“当谈论大衰退这类话题时，你知道，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否包容彼此之间的差异，能否意识到我们彼此是相连的。”

萨默斯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在未来有关金融危机的所有工作中，必须考虑家庭的资产负债情况。同时，他为当时的决策者进行辩护。

“米安和苏菲犯了学院派经济学家常犯的错误。在这些经济学家中，许多人都不愿意去了解基于多种考虑而做出的政策选择，而这些考虑并不以简单模式为蓝本。”萨默斯这样写道。

米安反驳道：“正是这种政治上缺乏胆识和对严峻局势不了解才导致这些问题的出现。”

米安和苏菲写道，如果决策者能推动对负债家庭的救助计划，他们就能更好地管控这场金融危机。政府决心以牺牲那些深陷债务泥潭的家庭为代价，设法挽救银行。对此，两位作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米安说道：“你本可以对银行说：‘我们央行和财政部现在免费向你们提供资金。你们必须把这笔钱转给借款者。’”此外，政府本来可以下令暂停房屋止赎。“没有人能消化掉银行推向市场的400万套房子。”米安是通过相关数据才了解到这个情况的。

他的妻子艾莎说，他最看重的始终是数据，但也十分愿意接受合理的争辩。他们的两个小女儿认为私立学校实行的是精英教育，不愿去那儿上学，于是便跟父亲解释了自己的看法。

艾莎说，米安对此的反应是：“我们不应该送她们去那里。只要她们有合理的理由，我接受她们做出的决定。”

米安和艾莎从年轻时就认识了。在米安来到巴基斯坦向艾莎求婚，他们在拉合尔正式结婚。在艾莎的眼中，他的丈夫是一位非常严肃、正直的人。即使在他20岁出头还是学生的时候，“你跟他谈话就好像面前是一位40—45岁的中年人”。她觉得他们早年的关系“务实”且“实用”。“浪漫姗姗来迟。”她这样说道。

去年年底，他们的女儿（一个14岁，一个12岁）迎来了一个小弟弟。据艾莎讲，在获得终身教职并成功出版一部大作后，第三次做父亲让米安非常喜悦。

“当谈论大衰退这类话题时，你知道，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否包容彼此之间的差异，能否意识到我们彼此是相连的。”

她说：“他一直是一位了不起的父亲。但现在，他变得更加开明、更易接近。”

贫富差距和家庭债务

米安和苏菲有关债务问题的研究工作集中在债务占GDP的比重持续稳步增长的原因及后果上。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这一比例接近30%。自那时起，这个数字一直在激增，超过了100%。这种情况在全球很多国家都在上演。

研究人员目前正在探索的元叙述体现了这样一种观点：在世界各国，最富有的人赚的钱超过了他们可能用于消费的支出。米安说，剩余的部分不会用于投资，而是通过金融市场用于放贷，达到刺激消费的作用。

“全球经济目前主要依赖信用创造来催生足够的增长需求。”他说道。

米安指出，随着经过体系的信用流不断增加，为了鼓励人们增加借款，利率会不断下调。可当利率达到历史最低位时，利率继续下调的空间有限，这样就形成了当前的流动性陷阱，从而使全球各国深受低增长的困扰。米安隐晦地暗示道，这种信用“超级循环”的终结指日可待。

从这篇论文中，我们看到了令人震惊的社会政治影响，包括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以及世界各地愤怒的民粹主义，米安这样说道。

他说：“如今，在贫富差距扩大和不公正越发严峻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举步维艰。这造成了紧张的政治局面。肯定是哪个方面出了问题，民众都这么觉得，而且希望能找到答案。”

米安认为，增长不均衡是造成这个信用超级循环的“根本病因”，从而让人们产生了一种被剥夺了社会权利的感觉。社会成本居高不下，影响深远。他引用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其中包括美国的儿童饥饿问题、黑人男性较高的监禁率、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较低等。

“如果你是火星人，当看到这种情况，你可能会说：‘什么？这些人疯了吗？’”米安说，“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数百万民众，而民众一旦团结起来，就能做出改变，这种潜能是巨大的。他们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将民众边缘化。要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发挥一定作用的话，我觉得我的作用就是告诉大家目前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共同繁荣

当米安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在他的祖国，正在掀起一场关于他个人的激烈争论。去年9月，巴基斯坦新当选的总理伊姆兰·汗任命米安出任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一职。尽管米安在国际社会享有很高的声望，但是他的提名却遭到巴基斯坦国内宗教右翼势力的猛烈抨击，因为他加入了艾哈迈迪教派。在街头抗议持续了三天之后，政府撤销了这一任命。对于期待着能为自己深爱的祖国效力的米安来说，这无疑是一件令他感到非常失望的事情。

在道德信念的激励下，米安在研究中极力主张经济发展成果要为更多民众所共享。他说，这是因为经济学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财富是相互关联的。

今年年初，他成为“求索共同繁荣”（Economics for Inclusive Prosperity）11位创始人中的一员。这个由经济学家构成的组织保证要想方设法提出让全体民众共享繁荣的政策建议。

该组织在自己的网站上宣称：“虽然繁荣历来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但‘共同’这个修饰词却要求我们要考虑所有人的利益，不仅仅是普通人的利益，而且还要思考广义上的繁荣，包括与金钱无关的幸福来源，比如健康、气候变化和政治权利。”

他为什么会支持这个组织呢？米安表示：“因为我们大家都身处‘其中’，无论‘其中’是什么意思，都关乎大家的利益。”^[1]

康铉承（HYUN-SUNG KHANG）是IMF信息交流部公共事务交流高级官员。



照片：由欧洲中央银行提供。

说服市场

彼得·普雷特重温欧洲央行在面对欧元危机时采取的一些非同寻常的货币政策

丽贝卡·克里斯蒂

2019年6月，比利时央行行长彼得·普雷特（Peter Praet）在担任欧洲央行执行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八年后正式卸任。在回顾自己过去在一线工作的岁月时，普雷特向记者丽贝卡·克里斯蒂（Rebecca Christie）讲述了自己任期内最愉快的时光。这次采访让我们有机会了解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内幕。正是因为这场危机，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在2012年7月做出了著名的承诺：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欧元。这一史无前例的承诺不仅减轻了市场恐慌，而且使决策者有时间坚定执行自己在应对危机时的承诺，并勇敢面对接下来在负利率时期振兴欧元区的经济过程中出现的挑战。

《金融与发展》：在你进入欧洲央行工作时，当时的氛围怎么样？

普雷特：2011年6月，在金融危机爆发几

年后，我进入欧洲央行工作。2012年1月，我出任首席经济学家。当时的情况不太好，因为当时的环境就像2008—2009年我在比利时银行业危机期间经历的那样。可这一次是市场恐慌。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要时刻准确采取果断的措施。2011年7月，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是否要提高利率。当时，我还不是首席经济学家。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支持这个决定。

尽管那时金融危机已经爆发，而大家的想法仍是尽可能避免油价上涨所带来的二次影响。当时的通胀率接近3%，还存在工资压力。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当时，主权债务市场的局势也很紧张。2011年，我们采用了一种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首次加息是在春季，接着在7月再次加息，我就是在那时加入欧洲央行的。可在当时，由于金融行业获得了充足的流动性，人们仍认为金融危机是可控的。

如今我们明白，事情并非如此。

《金融与发展》：当你意识到情况并无好转时，甚至在油价开始下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普雷特：当时的情况确实截然不同。因此，我们开始讨论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金融政策架构，毕竟当时的局势更像是反通货膨胀，甚至更糟。

《金融与发展》：欧洲各国领导人在计划建立一个银行业联盟，由欧元区共同监管，并建立主权债务防火墙——欧洲稳定机制方面做得如何？哪些事情只能由欧洲央行做呢？

普雷特：可能只有马里奥·德拉吉才能阻止2012年的市场恐慌。当然，他那句名言“不惜一切代价”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当时恰逢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6月召开的欧洲理事会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建立银行业联盟和危机管理机制。这就是当时的政治背景。

还真得要感谢马里奥。要想遏止市场恐慌，需要有强大的沟通能力。你必须要有能力说服市场。“不惜一切代价”这句话说的真好。

《金融与发展》:在你们的办法奏效后,你是否松了一口气?

普雷特:2012年底,市场恐慌消失了。当然,也产生了一种利好因素。这表明,我们可以采取措施来改变事件进程,控制事态发展。我想,这对激励我们继续做好工作来说,确实极为重要。

可在这之后,我们开始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我们必须找到一些非常规的工具。这是继比利时银行业危机和欧元危机后,我应对的第三次危机。这次危机的性质有所不同。这是一场潜伏的危机,在逐渐展开。由于经济持续走弱,加之信贷市场失灵,通缩压力不断增长。

在利率已经处于极低水平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满足总需求。我们该怎么做呢?为此,我们提出了很多创新的和非常规的措施。

《金融与发展》:在这种局面下,需要怎样的领导力,需要做哪些准备?

普雷特:你必须坦诚对待你的员工和合作者,要学会换位思考,并让员工也能这样做。在充满压力的情况下,最关键的是要有团队精神。我总是对自己当时比较平静的状态感到惊讶。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一直是这个有凝聚力的团队中的一分子。

《金融与发展》:在危机期间,你如何看待IMF的作用?

普雷特:我记得IMF的使命之一是评估对欧元区进行独立的“第4条款磋商”评估的好处,而且当时对IMF是否过于支持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存在质疑。评估团队没有发现我们之间有很多矛盾或冲突,而是发现我们的看法非常一致。“你们的关系是不是太近了,以至于批判性不够?”他们问道。我极力否认了这一点。

说实话,对于非常规举措,大家都没有很多经验。欧元区也不例外。日本和美国有一些经验,但背景不同。因此,我邀请了顶尖经济学家,他们对其他国家的政策很了解。我发现和他们一起探讨让我获益匪浅。此外,与诸如IMF这样的可靠的外部合作伙伴对话也非常必要。

《金融与发展》:这种关系的不断深化带来了什么启示?

普雷特:将更多的资源投向那些在金融政策制定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人,这样做是有价值的。IMF可能会注意这一点。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目前处在低利率环境之中。在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可能要进一步降低利率,即使利率已经接近于零,甚至为负。而且要安排很多人去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从理论的角度,还要从实践的角度。这不同于传统的利率政策,毕竟我们在购买资产或是对未来做出承诺,我们称之为“前瞻引导”。

是否要将非常规变成常规,至今仍存在很大争议。这是我们要跟公众解释和说明的事情。在利率从零继续下滑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关注金融稳定性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当利率长期处于低位,我们应如何在制定货币政策的过程中更多地将金融稳定性问题纳入考虑范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如果考虑了金融稳定性,那么偏离价格稳定这一首要目标的风险就会增大。

要想遏止市场恐慌,需要有强大的沟通能力。

《金融与发展》:未来各国央行行长在沟通方面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他们能否在推特这种简单的交流渠道与不太直接的渠道(比如演讲)之间取得平衡?

普雷特:总的来说,我不太赞成使用推特,尤其是央行的推特。这是因为不能把事情搞得太过简单,但也不能说一般人很难理解当下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努力向公众说明情况,但要当心,不能用太过简单的术语来描述复杂的情况。^[1]

丽贝卡·克里斯蒂(REBECCA CHRISTIE)是欧洲经济事务智库Bruegel的访问学者,曾任彭博新闻社、道琼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由于篇幅所限且为了表达得更清晰,本文对采访稿进行了编辑。

给我庇护

离岸避税天堂的财富加剧了不平等

藏匿在避税天堂的财富数量对不平等有着巨大影响。原因是什么呢？除非你能解释这些隐匿的财富，否则很难弄清楚真实的财富差距。于是，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为首的经济学家决定找出避免天堂的这些财富究竟是谁拥有的。

他们估计 2007 年离岸财富总额为 5.6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 GDP 的 10%，其中大约一半都在瑞士。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瑞士一直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离岸银行中心。瑞士央行会发布国内银行的离岸财富国别细目，这一点很方便。

那其他避税天堂的情况如何呢？2016 年，国际清算银行开始发布诸如泽西岛和卢森堡等离岸银行中心的银行存款来源的数据信息。例如，这使得我们可以知晓德国公民在中国香港所拥有的账户上有多少钱。祖克曼和他的合作者使用这两大数据来源估算各国的离岸财富占 GDP 的比率。

各国的该比率差距很大，从仅占 GDP 很小

比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到占 GDP 的 60%（俄罗斯、海湾国家和拉美国家）。有意思的是，他们发现离岸财富与自然资源、政治不稳定的历史以及毗邻瑞士等情况之间存在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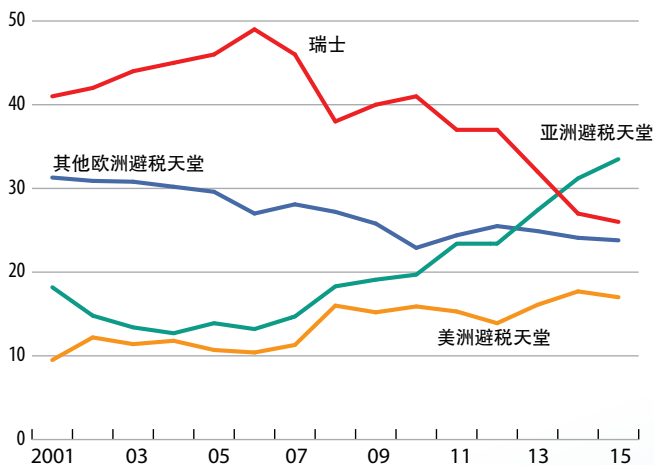
包括 2007 年从汇丰银行瑞士分行泄露出来的机密记录在内的其他数据表明，离岸财富分配向富裕人群严重倾斜：约 80% 的财富属于 0.1% 的那部分最富裕家庭。结论：对离岸资产的核算大大提高了最富有人群的财富份额。换句话说，不平等情况可能比其他研究所发现的要严重得多。FD

本文由《金融与发展》的李丽军和克里斯·威利茨（CHRIS WELLISZ）撰写，基于“Who Owns the Wealth in Tax Havens? Macro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Inequality”（Annette Alstadsaeter、Niels Johannsen 和 Gabriel Zucman 著，2017 年 9 月发表于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见 <https://www.nber.org/papers/w23805/pdf>）。

份额变化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瑞士的离岸银行存款份额下降，而亚洲离岸中心的份额则上升。

（占所有避税天堂财富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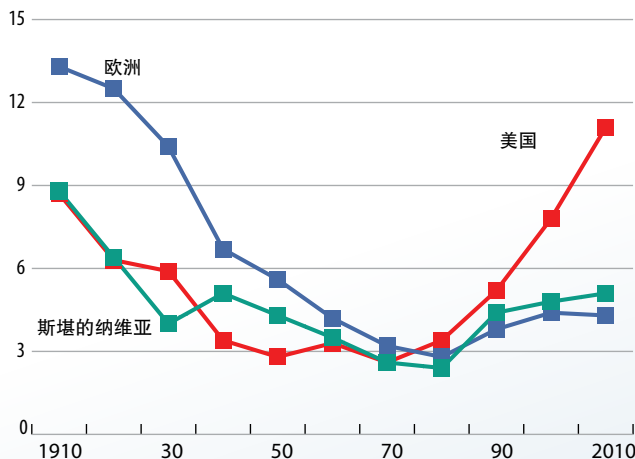


注：美洲离岸中心包括开曼群岛、巴拿马、美国。亚洲离岸中心包括巴林、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巴哈马、百慕大和荷属安地列斯。其他欧洲中心包括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格恩西、泽西岛、马恩岛、卢森堡和英国。

时光隧道

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最富有的 0.01% 人群的财富已恢复至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水平。相比之下，财富更多地集中在美国，美国最富有的 0.01% 人群的财富份额已超过 20 世纪初的水平。

（最富有的 0.01% 人群的财富份额，包括离岸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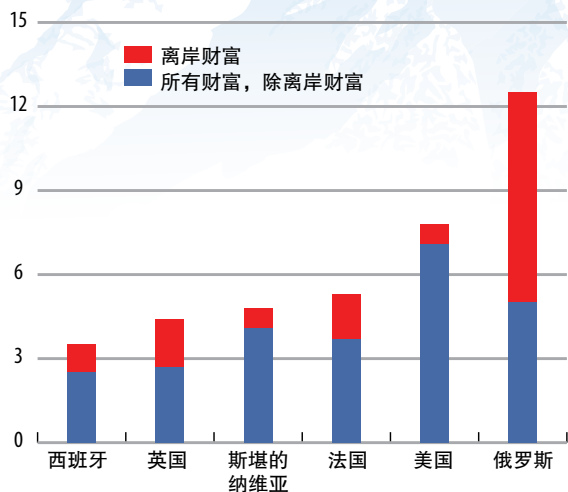


注：欧洲的数据是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的平均数。斯堪的纳维亚的数据是丹麦、挪威和瑞典的平均数。图中的每个方块代表一个十年平均数：1910 年是 1900—1909 年的平均数；2000 年是 2000—2009 年的平均数。

财富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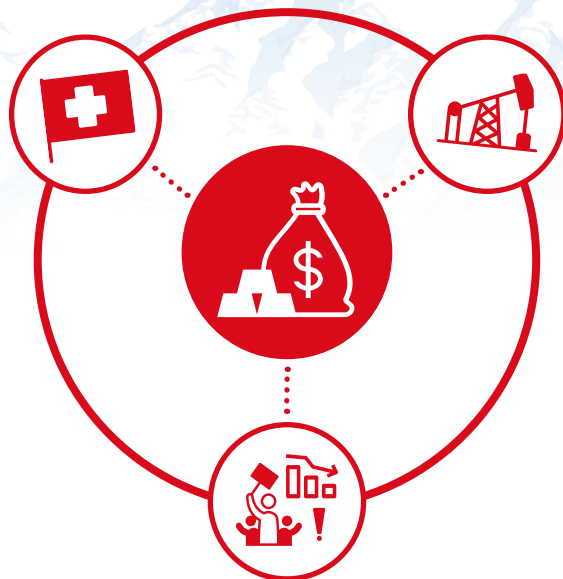
如果将离岸资产计算在内，最富有的0.01%人群所拥有的财富份额将大大增加。

(最富有的0.01%人群的财富份额及其组成，2000—2009年平均，占家庭财富总额的百分比)



离岸财富与什么有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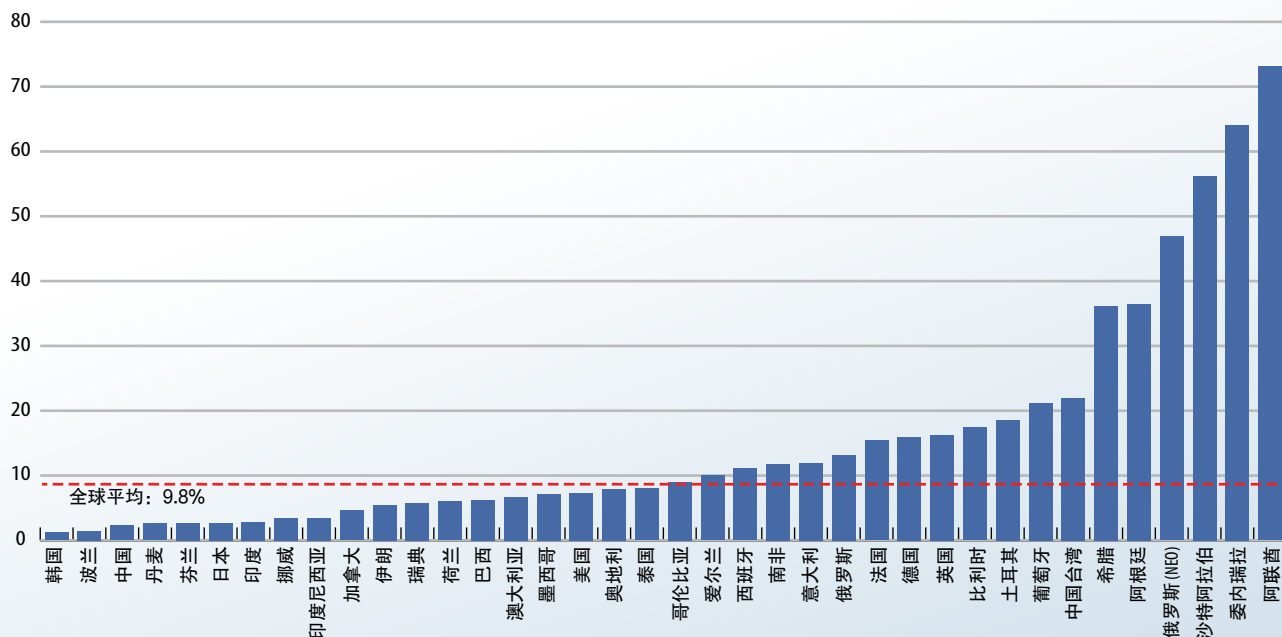
靠近瑞士与离岸财富的增加有关。自然资源的存在以及政治和经济不稳定性也是如此。



全球差异

各国（地区）在避税天堂的财富份额相差很大。

(离岸财富，占GDP的百分比，2007年)



注：该样本包括2007年GDP超过2000亿美元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离岸财富是基于离岸中心双边跨境银行存款的地理分布，对全球离岸财富进行分配。俄罗斯 (NEO) 表示通过累积国际收支中的净误差和遗漏而得到的另一种估计数。

NEO指净误差和遗漏。



点亮经济增长

地球夜晚卫星图揭示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其他很多信息

姚佳雄

近 30 年来，科学家一直使用地球夜晚卫星图来研究人类活动和自然事件。这些卫星图经常被称作“夜灯”。过去 10 年间，经济学家也开始纷纷效仿。他们意识到，夜灯有助于衡量经济增长、描绘贫困状况、分析不平等问题，以及解决众多无法解答的问题，尤其是在缺乏数据的情况下。事实上，如果外星人从地球的阴暗面接近地球，那么他们在到达大气层之前，就早已经掌握

了有关全球经济的一些基本情况。

从外太空看去，人类的灯光秀颇具异域色彩，有反复出现的主题。让我们来看一下朝鲜半岛。我们会对半岛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巨大差异感到震惊（见图 1）。那是黑暗与光明、封闭与连通之间的反差。回顾过往，我们会惊叹于中国和印度夜间的灯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越来越亮。这是一个关于发展、成长、开放与全球化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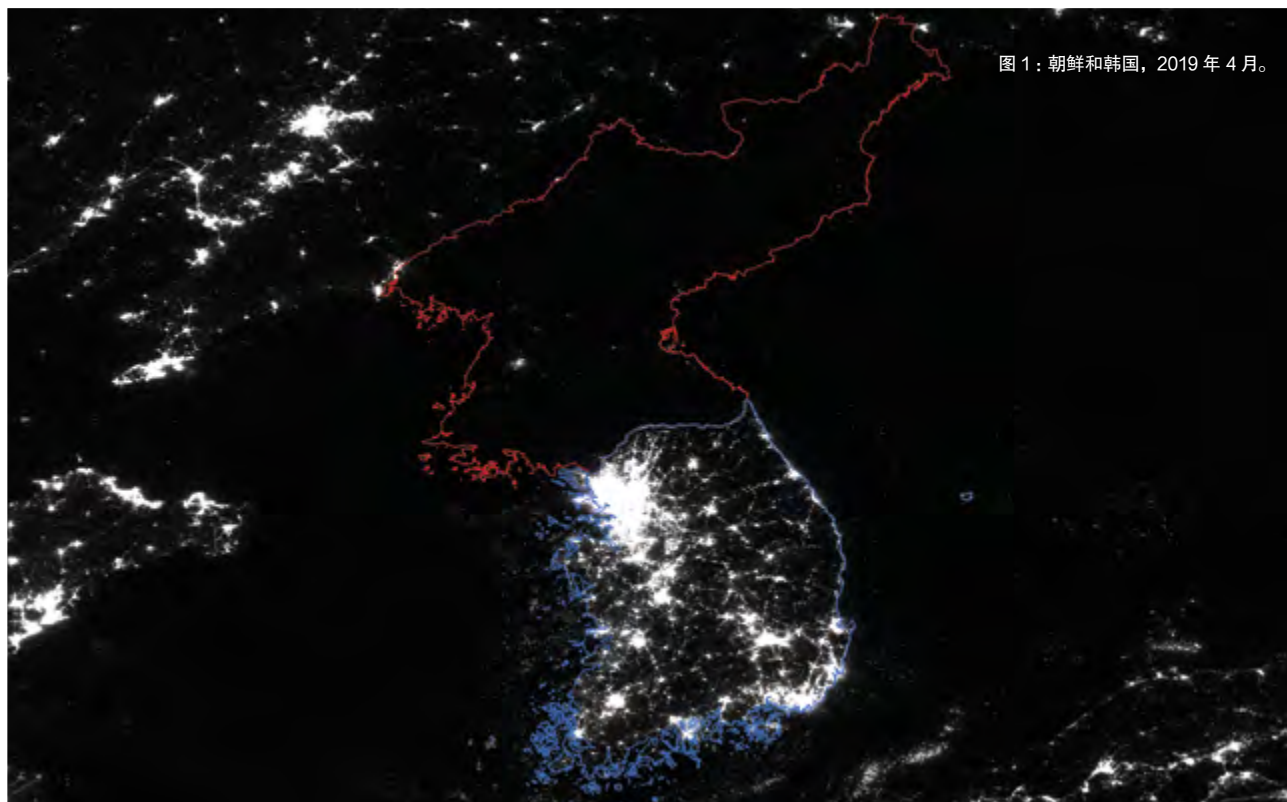


图 1：朝鲜和韩国，2019 年 4 月。

图片：NASA/NOAA

夜灯如何在经济学领域中应用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要回到卫星图上，了解这些图的基本构成。卫星图的每个像素代表着地球上不足一平方公里的面积。像素对应着一个数值，可衡量夜间的亮度。某个地点的亮度越高，这个像素的数值就越大。当我们加总一个国家内部所有像素的数值时，它就成了一种指标，可测量该国的夜间活动。在对一定时间内各国的这一指标进行比较时，该指标就成为衡量经济发展与波动的晴雨表。

体现不断变化的经济

夜灯对经济学的意义基于它们与经济活动的高度相关性，即便大多数经济活动发生在白天。一般来说，夜灯体现了经济中不断变化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空间上的扩张，或者不那么常见的空间收缩。在发展中经济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地区会逐渐变亮，更多的像素会开始记录下这些灯光（见图 2 和图 3）。相比之下，在那些

如果外星人从地球的阴暗面接近地球，那么他们在到达大气层之前，就早已经掌握了有关全球经济的一些基本情况。

陷入冲突的地区，成片的土地陷入黑暗，更多像素也开始变暗。

另一方面是灯光的强度。随着农村地区城市化，城市群不断扩大，基础设施现代化，同一片夜空变得明亮起来。卫星传感器记录下了更强烈的灯光。

然而，夜灯与经济发展之间并非直接相关。在我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胡颖尧一起开展的研究中，我们将夜灯与 GDP 进行了对比，GDP 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的表现的官方的标准，也是最常用的标准。结果我们发现，富有的国家的确要比欠发达国家更亮一些，但例外的情况也时常发

图片：ISTOCK/WAELA BREWEE

图 2：1992 年的亚洲。



图 3：2013 年的亚洲。



图片：NASA/NOAA

生。就人均 GDP 而言，北欧各国一直是世界上最明亮的区域。相反，日本虽说是一个富裕国家，可其夜灯的亮度并不比“阿拉伯之春”之前的叙利亚好多少，这也可能是因为日本历来重视节能且国内人口密度大造成的。

当我们试图解释某个国家的夜灯特点时，我们发现了一种有趣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从打造物质资本向培育人力资本的巨大转变。

那些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国家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基础设施上——建设公路和桥梁、火车站和机场，升级电网和电信设施，所有这些在夜间都会发光。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卫星图上，这些地方的夜空看上去越来越明亮。

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通过科技创新来驱动经济增长。与支撑这种创新的基础设施相比，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增长与夜灯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事实上，在发达经济体中，夜灯的增速仅是

尽管一百多年来，夜灯一直在为地球提供亮光，但是我们借助夜灯探索地球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GDP 增速的一半。

那些缺乏准确官方统计数据的国家的情况如何呢？

地球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深陷冲突的国家更缺乏良好的经济数据。然而，这些深陷冲突的国家是我们最需要追踪和了解的地方。这些国家的统计部门可能早已停止运转，可卫星仍在见证它们的经济活动。

因此，我们可以基于与其他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相似性，利用夜灯来重新评估深陷冲突的国家的 GDP。我们发现，基于夜灯的 GDP 衡量方法表明，在冲突期间，经济恶化的速度超过了官方数据显示的程度。此外，这种衡量方法也揭示了，在冲突结束后，经济将出现更强势的触底反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非正规经济的兴衰在这种冲突发生之后的环境中发挥着一定作用。

夜灯的价值不限于经济学中的某个指标。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夜晚卫星图中的每个像素看作是一个数据点，仅一个国家（例如，美国）就会由成千上万个数据点构成。全球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地球的陆地表面有大约 10 亿个数据点。

这个海量数据仅是对那些分辨率很低的早期卫星图的计数。随着越来越频繁地发布分辨率更高的卫星图，这一数字将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如今的技术正在使其成为可能。通过过去已经上天的几百颗卫星，以及未来更多要发射的卫星，不夸张地说，卫星图上的信息正在出现爆炸式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夜灯所反映的不再是地球黑暗的一面，而是其数字化的一面。

获得全新的认识

借助于大数据，我们拥有了提取信息的全新技术和对这个世界的全新认识。不难想象，诸如机器学习等数据科学的发展可用来分析模式，并协助完成数据相关的决策。很多公司正在这样做，如 DigitalGlobe 和 Orbital Insight。随着数据科学的进步，大数据的颗粒度可用来研究广袤地球各个角落上的局部效应、空间溢出和经济活动，而有时唯一可靠的信息来自于数百英里以外的太空。

大数据不仅限于夜灯，大量的数据中蕴藏着无数的故事，而我们的发现才刚刚开始。通过卫星数据、地理空间数据、文本数据和其他新出现的无穷的信息源，我们可以获得有关经济学新的视角以及形成新的思维方式。

在黑暗无际的宇宙中，地球只是悬浮于阳光里的一处微妙的所在。如果不是因为人类的文明，其黑暗面仍将保持黑暗，就像过去数十亿年来一样。尽管一百多年来，夜灯一直在为地球提供亮光，但是我们借助夜灯探索地球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随着进入大数据时代，机遇无处不在。我们应该把握机会大步前进，发挥大数据的作用，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经济，引导制定更为睿智的政策，从而让世界更加美好、更加明亮。FD

姚佳雄是IMF非洲部的经济学家。

本文基于胡颖尧和姚佳雄撰写的IMF工作报告（19/77）。

什么是压力测试？

检查银行的健康状况对确保金融稳定至关重要

马丁·契亚科、大浦博子、莉莉安娜·舒马赫



如何知晓金融系统是否健康？如果银行一半的房贷客户失业，不再还贷，银行能否安然渡过危机？如果东京发生8级地震，保险公司是否有足够的财力支付理赔？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隐藏在压力测试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银行等金融机构遭受了严重损失，各方对压力测试的关注度因而直线飙升。雷曼兄弟等一批大型老牌机构纷纷宣告破产，其他机构则依靠来自纳税人的数十亿美元纾困金勉强度日。民众也忧心忡忡，害怕银行会在一夜之间倒闭。有鉴于此，在遭受危机重创的经济体，国家当局相继开始大规模使用压力测试，希望借此减少银行健康的不确定性，并确定挽救难以为继的银行的方法。

压力测试一般会考虑偿债能力和流动性，前

者指银行是否具有足够资本抵消损失，后者指银行是否具有足够的现金支付存款等债务。假设房价下跌一半，银行将损失10亿美元。如果银行资本达到100亿美元，而非10亿美元，那么该银行便能存活，即银行具备偿债能力。如果该银行的存款客户出现恐慌，突然提走5000万美元，情况又会怎样呢？如果银行拥有政府债券等适销资产，那么该银行在无法筹措到足够资金填补被提走的存款的情况下也依然能够存活。

后果严重但合情合理的场景

压力测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设计一个后果严重但合情合理的负面场景。就严重性而言，压力测试者会假设一个小概率事件，但该事件可能

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比如百年不遇的地震、再次出现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或政府债务违约。就合理性而言，火星入侵等荒谬的假设不在此列。可以借鉴历史来设计合理场景，但这样的场景可能无法捕捉新型风险。举例而言，合理场景可以包括新金融科技的颠覆效应，或气候变化——这些事件尽管尚未发生，但却合情合理。

在设计场景时，首先要制定一份清单，列明一国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比如，一个严重依赖工厂生产的经济体面临制造业崩溃，或一个依赖旅游业的国家遭遇恐怖袭击。接着，压力测试者会为该场景设计一条故事线，估算上述风险对GDP和利率等变量的影响。

为了了解负面场景如何影响银行健康，压力测试者首先会衡量银行客户对此的行为反应。为此，他们可能需要计算在经济下行期间，有多少家庭和企业会继续偿债，以及他们会如何减少银行存款。然后，压力测试者会衡量上述行为对银行流动性和资本造成的影响。

由于银行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部分银行的损失会波及整个金融体系，进而影响整体经济。比如，如果银行不再放款，会发生什么状况呢？企业可能会因此缩减运营规模，并裁员。如果没有房贷，家庭可能无力购房。

新兴风险

鉴于银行的规模及其对经济的重要意义，压力测试往往以银行为重点。但是，其他金融服务提供商和资金来源却一直在高速增长，比如债券销售。因此，压力测试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在共同基金、保险公司、其他非银行服务提供商，以及新型风险来源中。比如，在近期的压力测试中，IMF研究了新金融科技的崛起如何挤占现有金融服务企业的利润。与此同时，在云计算等服务中，银行对第三方的依赖日益加深，这给压力测试带来了新的挑战。

另外一个不断演变的挑战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会带来两类风险，即自然风险和转型风险。自然风险已然可从日益频发和严重的洪灾、旱灾及其他自然灾害中窥见一斑。这可能会让销售房

屋与灾害保险的保险公司遭受损失，抑或会让它们因此大幅提高保费，使得大量家庭无力投保。转型风险可能因征收碳税而导致的煤炭业低迷所触发。由于财务损失，相关企业可能会出现贷款违约，从而使银行利润遭受重创。这些企业发放的债券和股票也会贬值，让投资者遭受池鱼之殃。

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IMF在业内率先运用压力测试，并将其纳入金融部门评估规划。金融部门评估规划主要面向IMF与世界银行自1999年以来共同运行的成员国。IMF的压力测试针对整个金融系统，而非个别机构，这是其与众不同之处。一旦识别出风险，评估规划负责部门会向国家当局推荐规避风险的方法，防患于未然，而在风险发生时，也会推荐控制风险的方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欧元区等地区当局都进行了压力测试并公布了测试结果，以此增强金融系统的信心。与IMF的压力测试不同，这些地区当局重在通过压力测试识别个别银行的短板并制定举措，让其恢复至健康状态或接近健康状态。

压力测试小诀窍

有效的压力测试离不开可靠、及时和详细的数据。历史数据应同时涵盖动荡期和稳定期。如果数据不完整或不准确，结果就不可靠，因而可能会导致对舒适期的误判。

最后，不要单独开展压力测试。完善的风险分析应将压力测试糅进其他定量和定性工具之中。此外，进行金融稳定性评估时，还应审视一国的金融政策、监督框架和金融安全网（如是否有存款保险及保障的范围）。作为综合深入评估的一部分，压力测试大有作为。FD

马丁·契亚科（MARTIN ČIHÁK）是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处长，大浦博子（HIROKO OURA）是该部的副处长，莉莉安娜·舒马赫（LILIANA SCHUMACHER）是该部的高级经济学家。

更多有关压力测试的信息，请访问www.elibrary.imf.org，在搜索栏中输入“stress testing”。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评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评论》是IMF的官方研究期刊，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一流期刊。该期刊影响了学术界、更广泛的研究团体和世界各地的决策者，为讨论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政策问题提供了一个进行严谨分析的平台。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palgrave.com/us/journal/4130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评论》仍然是分析严谨和政策相关的国际经济问题的最佳平台。”

——Barry Eichengree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George C. Pardee和Helen N. Pardee荣誉教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修复资本主义

市场和国家一直都在争夺列宁所称的经济制高点。继柏林墙倒塌之后，市场似乎占据了上风。甚至一直支持大政府的左派人士也改弦更张，转而支持自由市场。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 (Larry Summers) 曾公开表示对经济学泰斗米尔顿·弗里德曼“不甚敬仰”，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其供职美国财政部时，却力推金融全球化，并主张全球资本自由流动。

拉古拉姆·拉詹 (Raghuram Rajan) 从不被美好蒙蔽。作为自由市场的坚定支持者，他坚信自由市场的好处，但也不避讳它的弊端。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拉詹写道，受竞争伤害的一方应借助帮助，从伤痛中恢复过来，力争实现美好的未来：“市场需要为自己着想的人。”2005 年，在一次演讲中（如今这次演讲倍受推崇），拉詹警告说，金融过度全球化会提高“灾难性融合”的可能性。这一言论招致萨默斯的大力谴责，他称拉詹有“勒德分子”倾向，并且是在“以讹传讹”。

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近期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都印证了拉詹的先见之明。在这本新书中，拉詹不仅指出了资本主义不受约束所带来的危害并提出警告，而且试图更进一步，提出修复资本主义的方法。他建议要修复社会的第三支柱，即社群。拉詹认为，社群是指居住在某一地区、受同一个政府管辖，并有着相同传承的社会群体。在拉詹看来，市场和国家仍然不可或缺，但“当这三大支柱实现适度平衡时……社会能够最好地满足公民的需求”，特别是对那些在贸易和技术的影响下处于弱势的人士而言。

拉詹同时还重点指出了国际贸易的危害。比如，随着来自他国的竞争的加剧，美国就业机会不断流失，导致非拉美裔中年白人男性的预期寿命不断缩短。拉詹写道：“这相当于 10 场越南战争同时爆发，但这不是发生在遥远的地方，而是发生在美国小镇和乡村的普通民众的家里。”然而，这些社群的命运却普遍被主流老牌政党忽略。对



拉古拉姆·拉詹
第三支柱：社群是如何落后于市场与国家的
企鹅出版社，纽约，2019 年，464 页，30 美元

于这些政党，拉詹悲叹道，“他们甚至不承认变革的必要性”，而且往往还要苛责那些在贸易和技术影响下的失败者，认为他们是一群可悲的人。

当然，拉詹知道社群也会带来危害。本书对市场和国家如何成功克服封建社群的缺点有一段精彩的描述，这些社群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居所，但却无法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摆脱赤贫状态。现代社群也会自我封闭，比如，过度强调传统、害

必须将权力从国际和国家层面下放至社群。

怕陌生人和新创意的现代社群会让人们“深陷在过去的牢笼之中”。

拉詹还认为，市场和国家侵占了社群的权力，造成失衡，进行调整势在必行。必须将权力从国际和国家层面下放至社群。拉詹指出，随着机器人和机器人开始替代人工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人类的工作重心将“重新放在人际关系之上”。社群也可能成为未来的工作场所。FD

普拉卡什·洛嘉尼 (PRAKASH LOUNGANI) 是 IMF 独立评估办公室助理主任。

货币整形

日本用全息图、先驱人士和标志性的艺术来美化其货币

梅琳达·韦尔

几年后，当你拿起一张面值为 1000 日元的钞票，你会发现其一面是印有日本开创性生物学家的 3D 全息图，另一面印着世界上最著名的浮世绘版画。而在 5000 日元和 10000 日元钞票上，你将分别看到日本的一位女性教育先驱和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男子的 3D 图像。

日本政府最近宣布对其大部分货币样式进行彻底整形。2019 年 4 月，日本财务省宣布对三种最常用纸币（1000 日元、5000 日元和 10000 日元）以及 500 日元硬币进行重新设计，将尖端防伪技术与世界著名艺术品结合起来，并向科学领域、

商界和教育界的先驱致敬。

日本大约每 20 年更改其货币样式。这些新版纸币将在 2024 年开始流通，而新版硬币则将在更早的时候发行流通。

三位领军人物

新版纸币将纪念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日本近代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三位领军人物。

涩泽荣一（1840—1931 年），日本资本主义之父，其肖像将出现在日本流通最广的面值 10000 日元的纸币上。涩泽荣一是一位商业领袖、企业家，他创立了日本第一家银行，还创建和培育了包括东京证券交易所在内的大约 500 家其他商业和经济组织，其中一些企业至今仍在运营。他还是公民社会的拥护者，认为公共利益应该高于利润，并参与了数百个促进社会福利、教育和国际交流的组织建立。他曾指出，经济体没有国界。

津田梅子（1864—1929 年），女性教育的先驱，其肖像将出现在 5000 日元纸币上。1871 年，年仅 7 岁的津田梅子成为首批派往海外学习政府外交项目的女学生之一，这时距离日本结束持续 200 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仅 20 来年。在返回日本后，她投身女性教育，并在 1900 年创办了日本最早的女子学院之一（现在的津田塾大学）。

北里柴三郎（1853—1931 年），医生、细菌学家，其肖像将出现在 1000 日元纸币上。北里柴三郎发现了预防破伤风的方法，并与他人一起发现了引发黑死病的病原体，还成立了传染病研究



新版 5000 日元纸币正面是创立了日本最早的女子学院之一的津田梅子的肖像。



所，为日本现代医学奠定了基础。1901年，他被提名诺贝尔奖。

巨浪

新版日元纸币的正面展示的是日本历史上的先驱人士，1000日元纸币的背面是具有创新价值和巨大影响力的艺术作品：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这是日本传统浮世绘的代表作。

这幅作品完成于1830年，艺术家用一种名为“普鲁士蓝”的新的蓝色颜料精心勾勒出一幅巨大的海浪。当时的日本正处于闭关锁国时期，这种颜料是从欧洲进口的。葛饰北斋笔下的巨浪充满戏剧性，翻卷的浪花如同利爪，远处，富士山巍峨矗立，近处，渔民蜷缩在颠簸于巨浪中的船上，这一刻的动与静跃然画面之上。最终，葛饰北斋的很多画作离开日本，走向世界，并影响了很多国外的艺术家，包括莫奈、卡萨特和梵高。

在5000日元和10000日元纸币的背面将分

别印有紫藤花和东京火车站。

1000日元纸币背面的巨浪充满动感，而所有三种新版纸币正面的动感则是通过复杂的3D全息肖像图来完成的。日本财务省称，当纸币倾斜时，3D全息肖像图看上去会转动，这是全球首次在纸币中采用这项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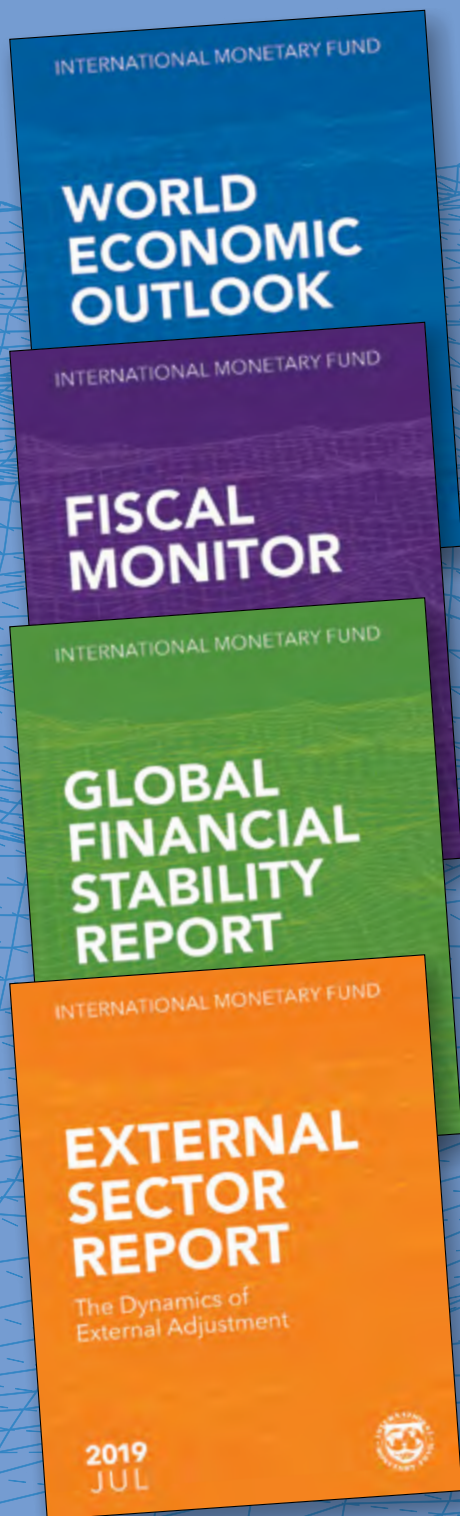
重新设计的新版纸币还将有新的安全防伪措施，包括高清防伪水印、全息条和全息补丁。新版纸币将使用日本本土材料制作。

虽然政府大力提倡无现金交易，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现金在日本依然非常受欢迎。尽管无现金支付比例上升，但流通中的货币量也在增加，部分原因在于人们的储蓄习惯。据日本财务省的代表称，仍有必要充满信心地提供货币。他们期望这些新的设计能够做到这一点。FD

梅琳达·韦尔（MELINDA WEIR）是《金融与发展》的员工。

新版1000日元纸币背面是著名画作《神奈川冲浪里》。

上网站IMF.org/pubs 下载最新图书



《世界经济展望》
增长放缓，复苏不稳定

《财政监测报告》
遏制腐败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成熟信贷周期中的脆弱性

《对外部门报告》
外部调整的变化

Finance & Development, September 2019



MFICA2019003